

臺灣民主韌性的挑戰： 重審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

連祉鈞*

摘要

近年臺灣頻頻遭中共多模態認知作戰侵襲，手段之繁複已逾越傳統學界對認知戰之界定。本文引介政治水平傳播之多模態框架，補充學界對新興認知戰手段與概念之認知，並闡明其因涵蓋惡意的「社會破壞型技術」，故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本文從跨領域視角探討臺灣近年應對認知作戰之理論與實踐，圍繞三大核心關懷：(1) 釐清認知作戰的多模態框架、(2) 供理論方法與示例實際分析、(3) 探討臺灣本土民主韌性理論的可能應對之策。

關鍵詞：水平傳播、民主韌性、多層次語言學分析、多模態框架、政治傳播學、認知作戰

投稿日期：2024.07.06 通過日期：2025.03.30

本研究無任何計畫經費補助，最終完稿受益於許多先進、友人與夥伴們的熱心幫助。針對此，筆者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惟礙於篇幅無法逐一署名感謝。謹此特別致謝幾位前輩老師：洪子偉、洪貞玲、傅文成、孫懋嘉、胡幼偉、黃上晏、甘偵蓉的不吝提攜與指點，對於啟發與臻善本研究成果乃具相當之貢獻。同時，非常感謝臺灣傳播學會、學刊編委會、匿名審查人的諸多包容與鼓勵支持。最後聲明並強調，一切文責當由作者自負，本文倘若有任何疏漏皆為拙筆者之責任。

* 連祉鈞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ljrjiun@gmail.com

Taiwan's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Its Challenges: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CCP's Multi-Modal Cognitive Warfare

Jr-Jiun Li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been consistently targeted by cognitive warfare launched by China, using tactics that demonstrate a level of complexity beyond traditional academic defini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cognitive warfare through a multi-mod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horizontal dissemination fro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expand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se strategies. It also asserts that since cognitive warfare includes “malicious socio-disruptive technologies,” such tactics should not be categorized under the rights protected by free speech. This study extensivel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s for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focusing on three primary concerns: firs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ulti-modal cognitive warfare framework; second, analyses of cognitive warfare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and third, proposing possible response strategies rooted in Taiwan's democratic resilience.

Keywords: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democratic resilience, multidimensional linguistic analysis, multimodal framewor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gnitive warfare

* **Jr-Jiun Lian** Ph.D. student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jrjiun@gmail.com

壹、臺灣民主社會面臨的新型軍事威脅：

中共多模態認知作戰

當臺灣這個長年堅守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Edwards, 2014 Hsiao, 2006）作為亞洲民主公民社會的典範（Alagappa, 2004; Fan, 2004）時，卻面臨來自中共敵對勢力逐步進逼與侵略之際，迫切需要理論工具與指引型文獻來應對新型的嚴峻挑戰。本文旨在提供並容或作為初探引介傳播語言學概念的反敵國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 CW）之指引型文獻。¹國外已有相當可觀且具代表性的指引型文獻（Aydemir, 2022; Backes & Swab, 2019; Cao et al., 2021; Claverie & du Cluzel, 2022a; Jaitner, 2015），深入探討俄羅斯侵略克里米亞與烏俄戰爭當中，雙方各自從事的認知作戰，以及第三方中國在烏俄戰爭中，現在與未來會扮演的戰略夥伴同盟策略角色的預測，以及分析其對印太區域戰略佈局的影響（Chang-Liao, 2023; Mendez et al., 2022），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北約）也於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法國召集會議探討認知作戰。雖然第四代戰爭（fourth-generation warfare, Benbow, 2008; Corn, 2006）中被廣為接納的「多模態混合戰（multimodal hybrid warfare）」這類概念並不新穎，然而，當即運用「多模態框架（multimodal framework）」到「認知作戰」上，並提出「多模態認知作戰（multimodal CW）」的見解，仍在華語文獻中實屬罕見，同時，在外文文獻中亦屬相當晚近而未被完全釐清的新穎概念（Claverie & du Cluzel, 2022a; Masakowski & Blatny, 2023; Paul & Matthews, 2016）。

本文將透過詳細闡述中共「多模態認知作戰」中的「水平傳播」（horizontal transmission）特點，做出具原創、嶄新且恰當的釐清與說明。²另一方面，回顧當前華語學界的相關學術文獻，本文勉可稱作率先且明確指出並闡釋：「中共所主導發起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實已係使傳統學界對於『認知作戰』與『政令宣傳』（policy propaganda）的標準二分法差別逐漸消弭」此一命題，亦可在國內外相關文獻找到若干相似的觀點（Gershaneck, 2019; Hung & Hung, 2022）。而本文如此主張背後的主要理由，詳如接續段落所述。

本文指出，中共近年進行「多模態認知作戰」時，明顯使用「多模態傳播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transportation)」(Kamalu, 2016; Dancygier & Vandelanotte, 2017; Thorhauge & Lomborg, 2016) 的作戰策略，透過混合「認知作戰」與「政令宣傳」的界線 (表 1)，從中共至臺灣採取政治橫向 (而非縱向上對下) 的水平傳播，並運用相當豐富且多樣化的「傳播媒介 (mediums/platforms)」與「傳播形式 (modes/forms/dissemination)」(Bryant & Miron, 2004; Chaffee & Metzger, 2001; Rafaeli, 1988; Stevenson, 1997)，如：文字、圖像、影音等，輔以相當豐富多元的傳播媒介與形式，呈現高度異質化的「爭議資訊」、「假新聞」(Adams et al., 2023; Lazer et al., 2018; Lewandowsky et al., 2012) 或「錯誤訊息」，傳遞具有危殆統戰威脅的政治軍事觀點，企圖影響臺灣部隊的軍心與民間輿情，並藉此強烈分化臺灣內部意識形態不同的民衆互相敵對，仇視對立。

表 1：「認知作戰」和「政令宣傳」的傳統二分法

傳統標準分類	認知作戰（認定要件）	政令宣傳（認定要件）
特點描述	（一）具有軍事意涵	（四）傳達政策訊息
	（二）敵國政治作戰	（五）增加公眾參與
	（三）改變群眾認知	（六）爭取民眾支持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與整理自相關代表性文獻（蒐集時間 1994 至 2023）。

中共多模態認知作戰主要呈現的水平傳播特點包括：

- 一、內容形式多樣化 (content diversification)：其素材不侷限於單一的文字形式，而是融合了圖像、音樂、影音、電視、網路平台、社群媒體等多種媒體元素 (Buscemi, 2022; Hull & Nelson, 2005; Wang et al., 2020)。
- 二、交互性增強 (interactive enrichment)：閱聽人可以通過多種感官管道，如：閱讀 Line 與 Facebook 上的網路即時新聞影音、接收客製化廣告、觀看 YouTube 影片、收聽 Podcast、線上聯網遊戲、參與抖音 (TikTok) 活動、瀏覽小紅書、使用 Instagram 與 Threads 此類社群軟體轉推發文等接收資訊，並

進行高度刺激性的互動社群反饋，提高此類政治宣傳橫向傳播的閱聽人參與度（Chaffee & Metzger, 2001）。

三、生動化形象（vivid representation）：多模態水平傳播產生的效果在於，其能具備更多不同角度來呈現事物的特定面貌，涵蓋具有迷因類型傳播特徵的資訊與觀點（Dimitrov et al., 2021），中共充分利用上述多模態水平傳播的呈現特性，架構符合其統戰框架之敘事面貌，意圖來提高其統戰爭議資訊對於閱聽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意欲促使這些目標使用者對於某些特定媒體與傳播媒介（報紙、電視、廣播、網路）的用戶黏著度（customer stickiness）與產品黏著度（product adhesion）上升。

四、跨媒體融合（transmedia fusion）：不同媒體形式之間可以相互引用（inter-referencing）、互相補充（complementary-interaction）、相互敘事（mutual-storytelling），並形成跨媒體敘事傳播（transmedia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NT）的效果，並在新興媒體生態的多重語域（multi-register）當中發揮其意圖與效用（Davis, 2013; Scolari, 2014）。

貳、言論自由民主社會的挑戰： 多模態認知作戰暨社會破壞技術

站在捍衛臺灣民主韌性的立場上，本文試圖答覆與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恰當理解與定位中共對臺的認知作戰」？事實上，要適當定位「認知作戰」實非易事，根據不同的實踐或學理考量，偏重層面皆會有所不同。而本文採取「政治傳播」中的「水平傳播」觀點，作為切入點來定位中共對臺的認知作戰，並藉由探討認知作戰的「多模態水平傳播特點」、「作戰方式與戰略目標」、「可供分析的實際方法」，試圖將中共對臺認知作戰的學術討論被嚴謹限縮在合理脈絡下；接著，本文簡易示例與提供多層次傳播語言學，分析當中的若干可能方法；最後，

本文以傳播學觀點探討我方在民主韌性理論上，容或能擬定的可動態調整之方針。³

「在什麼意義下，民主國家可以排拒認知作戰作為『言論暨表達自由』中的一部份」？要回答此一問題，需要回到整體大框架下的背景脈絡回顧，以及臺灣現階段遭受中共大量「多模態認知作戰」的後續效應。雖然臺灣（如同法國、美國等）作為最低限度管制言論（minimal speech regulation, De Montesquieu, 1989: bk.12; Greenawalt, 1989; Mill, 1998; Milton, 2014）的自由開放民主社會，強調國家與社會對於「無政府」（anarchism）、「反民主」（anti-democracy）、「反自由」（anti-liberty）的言論，仍然會展現一定程度上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寬容性（toleration）、與容忍性（endurance）（Forst, 2018; King, 2013; Masferrer, 2023; Newey, 2019; Williams, 1996）。

由此衍生問題有二：問題一、「臺灣作為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是否應容忍認知作戰作為表達或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本文引介「社會破壞型技術」概念，否定應容忍敵對勢力的認知作戰；問題二、「認知作戰是否恰巧擊中臺灣民主政體的弱點」？針對此，本文將在最後一節引介「民主韌性」理論及國外案例，說明民主國家雖對認知作戰有脆弱性，但仍有其可能的應對策略方針，吾人應對於臺灣的民主韌性抱持信心。

首先針對問題一，本文指出中共進行的「多模態認知作戰」製造的絕對不僅止、且已遠遠超出「抨擊政府（government-dissent）」言論自由的合理範疇（Gunatilleke, 2021; Schauer, 2018）。中共係透過大量惡意的「社會破壞型技術」散播許多造謠扭曲的假訊息、爭議訊息、恫嚇脅迫言論，意圖「瓦解臺灣的民主法治基石」、「煽動分化臺灣民衆的團結」（關於中共認知戰的四大戰略意圖，將接續詳述）。本文謹以為惡意的「社會破壞型技術」與「恫嚇脅迫之言論」，絕非表達或言論自由之所涵，凡此可參我國及諸民主國家刑法中公衆恐嚇罪與相關法規。而事實上，中共在新冠疫情前後發動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已經在近期對全球與臺灣珍貴的民主法治基石的核心價值，構成嚴重的內部威脅（Hsu & Cole, 2020; Yu & Ho, 2023）。同時，認知作戰當中所包含的社會破壞型技術，已影響到我們對於言論自由的法律考量基礎，各國智庫專家顧問亦公開呼籲與聲明，預計臺灣未來必定會面臨更加

艱困的挑戰，並督促臺灣務必做好完善準備（Dotson, 2024; Masafumi, 2024, May 5）。

就此點來說，在軍事意義上，現階段的半承平時期，中共大量進行具有「無形性」（immateriality）、「持續性」（persistence）、「滲透性」（permeability）的「多模態認知作戰」（Claverie & du Cluzel, 2022a）已帶來顯著的威脅與風險。誠如學者們所述，認知作戰具有「模糊界線」（blurring the lines）——模糊了承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界線的特徵（Cao et al. 2021; Franke, 2015; Mattsson, 2015; Taddeo, 2012）。由於認知作戰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故其事實上已經演變成未來在開戰前夕，立即得以直接無縫接軌一連串結合「網路灰色地帶衝突」與「實體灰色地帶衝突」（Carment & Belo, 2020; Mazarr Dr, 2015; Regan & Sari, 2024; Schmitt, 2017）的行動，如共機擾臺、海域漁民船試探界線、爭議性碰撞意外（可參考 2024 金廈海域翻船事件）等領土邊界糾紛，皆可能擦槍走火，發展為實際的軍事衝突（Nathan & Scobell, 2014; Song, 2023; Xiang & Huang, 2015），相關案例亦可參見烏俄戰爭相關報導與論文專書文獻。本文注重在重新審思中共對臺之「認知作戰」的類型暨其對研究框架之影響，提出多模態框架與政治水平傳播概念，並以實際案例分析，期許有助於以傳播學觀點應對臺灣所受認知作戰之威脅。⁴

叁、深理解與拓展中共經典認知三戰的基礎理論適用框架

自 2003 年 12 月中共修訂《軍隊政治工作條例》（《政工條例》）以來，對臺頻施「認知作戰」，其規模近年愈加日益擴大，愈亦難以精確計數。表 2 所示，乃經典「（中共）認知三戰」理論框架。

表 2：傳統經典的認知三戰理論框架

輿論戰	目標是影響國內外民意，操縱媒體和公共輿論。手段包括宣傳、媒體操作和網路輿論引導。輿論戰略不僅限於資訊的傳遞，更涉及深層次的意識形態操控。
心理戰	旨在影響敵對勢力的心理狀態，削弱其士氣和戰鬥意志。心理戰的手段可以包括威嚇、欺騙、情報操縱等，目的是讓對手在心理上崩潰或喪失作戰能力。
法律戰	利用法律手段來達成戰略目的，包括國際法、國內法和規範的利用與操縱。法律戰包括起訴、法律制裁、國際法庭訴訟等，旨在通過法律手段獲得戰略優勢。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與整理。

認知作戰三戰涵蓋「法律戰」、「輿論戰」與「心理戰」。本文指出，三戰其實亦有多層次與多樣面向，近期尤其多模態傳播特徵，值得深入探討。本節將從不同模式與分類展開討論，先以法律戰為例。國內罕論「抵禦型」(defensive)與「攻擊型」(offensive)法律戰，其在作戰目標、策略、特徵異同之處（見表 3）。抵禦型法律戰如美國助阿富汗之例；攻擊型法律戰則與我方相關，如中共修法懲戒「臺獨份子」、恣意解釋國際法、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法律行動（Quirk, 2021; Schmitt, 2017, 2021; Schmitt & Watts, 2015）；藉由法律相關行動打壓臺灣主權與國際地位，試圖以此主張擴張其領土主權及管轄權——此類攻擊型法律戰，實應慎之（Bartman, 2010; Dunlap Jr, 2009; Kittrie, 2016; Trachtman, 2016）。

表 3：抵禦型法律戰與攻擊型法律戰之比較

類型	抵禦型法律戰（defensive lawfare）	攻擊型法律戰（offensive lawfare）
目標	保護自身利益，抵禦他國的法律攻擊	主動利用法律手段達成政治或軍事目標
策略	強化本國法律體系，提高法律論述能力，反駁他國的法律指控等	制定有利於己方的法律，利用國際法律機制指控他國。通過法律手段限制敵方行動等
特徵	被動應對，以防禦為主	主動出擊，以攻擊為主
具體案例	美國在阿富汗的法律戰「建立阿富汗法治，落實軍事防禦目標」： （一）助阿富汗制定新憲法與法律體系 （二）培訓阿富汗法官和律師。 （三）建立法院和其他司法機構。	中國在南海與臺海的法律戰「國內法規與片面解釋對己有利的國際法」： （一）聲稱對南海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 （二）2009 起於南海填海造人工島：「必要國防設施」 （三）2016 無視國際仲裁法庭裁決，持續主張對南海的「歷史權利」 （四）片面解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聲稱擁有臺灣海峽主權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與整理。

本研究亦有區分「輿論戰（public opinion warfare，亦名「輿情戰」、「宣傳戰」）與「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operations, PSYOP）之異同。同時，本文指出往昔學界與民間所常關注之「（偏誤）宣傳輿論戰（disinformation campaigns）」，此類手段緊緊繫於「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當中涉及「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或「假新聞」之語義，為認知作戰較直觀可被理解之層面（見表 4）。

表 4：兩類認知戰之異同點

(偏誤宣傳) 輿論戰	心戰／心理戰
施行手段：利用（假）資訊、媒體和心理等手段以影響目標對象（主要是群體）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施行手段：利用恫嚇資訊、媒體和心理手段來直接影響目標對象（主要是個體）的心理，破壞其士氣和戰鬥意志
相同處 重要的非武力手段：達到政治、軍事和戰略目標 可能涉及虛假資訊、謊言、欺騙、誘導等手段 目標群眾：目的是廣泛製造混亂、誤導和操縱輿論，影響「目標群眾」的思想和行為 主要利用媒體、社交網路等管道散布虛假資訊	目標群眾：目的是特定直接影響「目標對象」（單兵或作戰單位）的心理，破壞其士氣和戰鬥意志 除利用宣傳手段，還可能包括心理暗示、恐嚇、脅迫、製造錯幻覺等手段
相異處 影響範圍較廣，可以針對公眾的輿論 主要針對目標群眾的認知和信念層面	相異處 影響範圍相對較窄，主要針對特定目標群眾 除了認知層面，還可能涉及情感和意志層面， 目的在於透過「認知滲透」削減「抵抗意志」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與整理。

然而，吾人迫切需要體認到的是，新興非傳統型的「(宣傳) 輿論戰」內容已非僅止於「偏誤宣傳」，更涵蓋無法歸類為假訊息的「爭議誘導資訊」與「脅迫恫嚇性言論」，此些訊息目的乃致引導「社會破壞型輿論」。往昔文獻當中，大多逕將「認知作戰」歸為「資訊戰」（而本文指出其異同），較未深化探析本研究提及其在多模態框架下的傳播特點，也較少澄清許多並非以「假新聞」、「假資訊」類型出現的新興輿論戰型態。

過往文獻針對「(偏誤宣傳) 輿論戰」的大致認定與定義是，對於通過散佈虛假資訊和偏頗的宣傳來影響公眾輿論，從而達到混淆視聽

和削弱對手信心的目的。其手段包括利用各類媒體平台散佈虛假資訊或製造混亂，甚至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輿論操控（Quirk, 2021）。實際案例：中共的網路「水軍」擾亂香港與臺灣，此類水軍謠言與本地輿論交融後，更難以何者為區分認知作戰之訊息、何者為真正的百姓輿情，即便提供證據說明，對於鞏固民心之助益恐亦有限。同時，國內外往昔許多文獻並未特別釐清「輿論戰」與「心戰」之異，並常混用「政宣」或「外宣」（中文混用前二者，英文混用“propagandas”）概括此類認知作戰的進行模式。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欲更深入的釐清「（偏誤宣傳）輿論戰」與「心理戰」的細部差異，並補充「假資訊」並不一定是「輿論戰」或「認知戰」的構成要件，本文試圖藉由多模態框架來指出認知作戰的必要條件，其實是其需具有政治水平傳播的特徵，筆者忝認為這項學理上的釐清，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避免落入過往學者易遭受的諸多學理上的誤解與意識形態上的批判。

表 5：「多模態認知作戰」類型：案例說明

資訊網路攻擊戰

針對電腦系統、網路和基礎設施進行攻擊。中斷情報傳遞、提高情報傳遞成本、獲取機敏資訊。

（Čížik, 2017a, 2017b; Denning, 1999; Franke, 2015; Iasiello, 2021; Jaitner, 2015; McCrory, 2020; Taddeo, 2012; Thornton, 2015）

抵禦型法律戰

透過法律手段阻止和防止侵略行為，而攻擊性法律戰則利用法律來攻擊和削弱對手，加強國家的法律框架以應對混合威脅並實施廣泛的防禦措施。包括通過法律或法規以威懾侵略行為並促進威懾效果。

（Bodnieks, 2023; Dunlap Jr, 2001, November 29, 2009; Kittrie, 2016; Quirk, 2021; Trachtman, 2016; Werner, 2010）

攻擊型法律戰

運用法律作為武器來攻擊對手。這可以包括但不限於在網路空間中的活動，如使用現代資訊技術對一國的整體法律體系進行敵對行動。

（Dunlap Jr, 2015; Goldenziel, 2020; Kittrie, 2016; Quirk, 2021; Qureshi, 2019; Trachtman, 2016; Werner, 2010; West & Insisa, 2024）

表 5（續）

（偏誤宣傳）輿論戰

國家支持的輿論戰，通常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正成為一種日益嚴峻的威脅，侵蝕對機構的信任並操縱公眾輿論。中國被發現使用社交媒體上的輿論戰來干預臺灣 2020 年總統選舉，改變公眾對香港抗議活動的看法，並宣傳中國政府的正面形象。俄羅斯也被聯繫到在 Twitter（現稱 X）、Reddit 和 4chan 等平台上進行協調的「網絡水軍」活動，散布虛假訊息並影響資訊生態系統。這些輿論戰可為是「混合戰」和「公共外交」策略的一部分，主要大國以間接和隱晦的方式競爭，影響第三方國家的內部政治。支持這些宣傳行動的外部來源缺乏透明度，導致民族主義公眾輿論易受「陰謀論」和「假新聞」的影響。現有的國際法律框架難以全面應對這一全球性挑戰，因為虛假資訊跨越國界，侵蝕對民主機構的信任。本文認同其他專家，呼籲我方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建立標準化規範，以應對這一對全球安全和社會凝聚力的威脅。

（Bayer et al., 2019; Bontcheva & Posetti, 2020; Gerrits, 2018; Hung & Hung, 2022; Paul & Matthews, 2016; Prier, 2020）

心戰／心理戰

主要旨在影響對手的心理狀態，削弱其士氣與戰鬥意志、陷入恐慌與絕望。心理戰的手段可以包括威嚇、欺騙、情報操縱等，目的是讓對手在心理上崩潰或喪失作戰能力。實例可以參考普丁對敘利亞與烏克蘭的心理戰、以及烏俄戰爭中雙方的心理戰活動，如烏俄之間的互相威脅和資訊欺騙，大量透過多模態水平傳播手段，目的皆是為了削弱對手的心理防線，且可以針對個體所處情境與背景評估，如同網路廣告後台精準投放「客製化心戰」這類的認知作戰。

（Blokh & Alexandrov, 2016; Davenport, 2018; Holzmann, 2020）

同時，本文指出，要理解中共當前對臺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吾人「至少」需要使用本文所提出「多模態認知作戰」（或位階處平行地位脈絡之「多模態資訊戰」）的「延伸三戰理論」（可視作原先三戰的延伸或補充）架構，其各自分別是：

一、（特定）資訊網路攻擊戰：

針對電腦系統與網路基礎設施進行攻擊，目的是破壞資訊傳遞，提升對手的作戰成本，或是獲取敏感資訊（Čížik, 2017a, 2017b; Denning, 1999; Iasiello, 2021; Jaitner, 2015; McCrory, 2020; Taddeo.,

2012; Thornton, 2015)，雖然攻擊設施部分屬於廣義「資訊戰」而非「認知戰」範圍，但其部分攻擊可成功「直接」改變我方「接收之資訊內容」、或至少「間接」影響或改變相應操作人員之判斷與行為，故在後者意義上可歸屬於認知作戰範疇內。

二、抵禦型法律戰：

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並抵禦對手的行動，包括制定或引用法律來對抗對方的攻擊行為，或者利用法律程序使對方的行動變得更為困難和成本高昂（Bodnieks, 2023; Dunlap Jr, 2001, November 29, 2009; Kittrie, 2016; Quirk, 2021; Trachtman, 2016; Werner, 2010）。實際案例：拉脫維亞的法律抵禦戰、我國之反滲透法。條文本身「實質影響」人民對於法律條文內容的「遵從」、「理解」、「認識」相應的義務權利與行為，同時此類認知作戰在戰略上一定程度意圖抵抗敵對勢力，故無疑屬於「抵禦型認知作戰」之範疇。

三、攻擊型法律戰：

利用法律手段來進行攻擊的作戰方式，包括提起訴訟、運用法律策略對付對手，以削弱其作戰能力或在法律層面上給予對手打擊。實際案例：「白俄羅斯透過法律戰攻擊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中國透過攻擊型法律戰處理南海領土爭議」、「中國透過攻擊型法律戰將兩岸事務定調為內政問題，拒絕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宣告臺獨份子可處以死刑、無需出庭受審」（Dunlap Jr, 2015; Goldenziel, 2020; Kittrie, 2016; Quirk, 2021; Qureshi, 2019; Trachtman, 2016; Werner, 2010; West & Insisa, 2024），藉以恫嚇我國公民網路發言、私人對話及出國意向，尤其對有需求赴中國之臺灣民衆產生寒蟬效應（孫懋嘉，2023），實為結合灰色地帶的「攻擊型認知作戰」主流手段之一，並與後續兩種認知戰（輿論戰、心戰）密切相關，在多模態框架下，以政治水平傳播手段實施。

四、（偏誤宣傳）輿論戰：

通過散佈虛假資訊和偏頗的宣傳來影響公眾輿論，從而達到混淆視聽和削弱對手信心的目的。其手段包括利用各類媒體平台散佈虛假資訊或製造混亂，甚至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輿論操控（Dunlap Jr, 2015; Quirk, 2021）。實際案例：「中共的網路水軍擾亂香港與臺灣」。中共網軍在社會或選舉議題受關注時，常以「偽裝草根」或「反串」方式影響輿論，意圖撕裂臺灣社會，破壞民主基礎。過去研究多集中於「假新聞」、「假訊息」的「偏誤宣傳輿論戰」，少涉及「（非偏誤宣傳）輿論戰」，該手段以「片面真實」或「完全真實」內容引導輿論，並具有「跨媒體融合」特徵，最終目標依舊是併吞臺灣；同時此手段符合本文所述多模態認知作戰的水平傳播特徵，試圖影響「大眾認知領域」與「公眾語域」（詳見後文）之輿論。每逢臺灣選舉年間，輿論戰常被視作具有「介選」意圖（沈伯洋，2021；松田康博，2021；Hung & Hung, 2022; Quirk, 2021）。

五、心戰／心理戰：

利用心理手段影響對手士氣和認知的作戰方式，通過心理威懾、欺騙、恐嚇等手段，影響對手的心理狀態，使其士氣低落、信心動搖，甚至引發內部矛盾和不穩定（Blok & Alexandrov, 2016; Davenport, 2018; Holzmann, 2020）。實際案例：俄羅斯在敘利亞、烏克蘭的心戰，並大量運用「多模態認知作戰」的「交互性增強」等手段，對個體心理進行操縱，容或結合實證心理學的多模態技術，達到「認知滲透」（cognitive penetration），影響感官接收器與神經訊號傳遞，進而影響其行為意向。

本文更進一步主張，上述五種認知戰的型態，實際上皆為實體戰爭的輔助作戰工具與策略。礙於篇幅，本文並不深入討論「資訊網路攻擊戰」（因其較不涉及直接針對信念、行為、情感作用的認知滲透部分；較多仍涉及資安與電腦科學層面），而主要聚焦考慮其他種類型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同時，本文的「延伸三戰理論架構」與過往國內

就法理上之文獻的「認知三戰理論架構」，可具有一定程度實質如何落實與研究的理論補充。在本文的「延伸三戰理論框架」下，反對逕自徹底將中共自 2003 年《政工條例》修正後開始發起「超限戰」或「認知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直接皆歸屬分類在「資訊戰」的「下位」概念。本文先前已在學理上明確指出「資訊戰」與「認知戰」有其語意概念上交疊之處，在國安或法理層面上，「認知作戰」在某些脈絡下確實可被理解為下位概念，但站在多模態政戰水平傳播的框架下，實際上並不需要逕將「認知戰」視作「資訊戰」之下位概念。

毋需否認的是，國內學者曾提出與討論延伸鑽石模型與四種認知作戰方式：外宣（propaganda）、粉紅（pink）、農場（content farm）、協力（collaboration）模式、節點分析、在地協力者、銳實力（sharp power）、制腦權等理論概念，確實都對於臺灣研究「認知作戰」的學者們有至關重要的階段性象徵意義，並且已經成為研究「認知戰」時不可忽視的參考指引型文獻（傅文成、陳怡全，2023；王韻，2023；沈伯洋，2021；Hung & Hung, 2022; Lin, 2023）。然而，本文強調並指出，隨著這幾年時間的推移，中共對臺灣的「多模態認知作戰」規格、方式、規模，實際上已經發生顯著的改變了。有鑒於此，本文主張中共現階段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已超越傳統「銳實力」、「超限戰」與「（素樸版）認知三戰」理論涉及的分析、理解與應對。本研究首次將政治傳播學中的新穎概念應用於認知作戰，剖析水平傳播、多模態框架的使用脈絡，藉以澄清幾種「認知作戰」模式在學理上的細緻劃分。此舉緣由實乃多模態認知戰愈加複雜、影響愈加深遠，亟需國內研究者提供嶄新的可能取徑來解釋及分析，多模態認知作戰具有的傳播特徵及實踐層面之影響。同時，本研究也主張，現階段要辨明「中共對臺之認知作戰」，除本文上述曾提及之傳播樣態與特點以外，釐清中共（作為準交戰敵對同級別政治實體）進行認知作戰的戰略目標，亦是恰當理解與定位認知作戰不可或缺的一環，詳見下節。

肆、中共對臺進行多模態認知作戰的多樣手段與階段性戰略目標

在戰爭理論上，當今資訊科技社會的快速發展與烏俄戰場中強調「非常規」、「非對稱作戰」的第四代戰爭型態（Benbow, 2008; Corn, 2006）、強調「混合戰」與「灰色地帶行動或衝突」（gray zone conflict）的第五代戰爭（fifth-generation warfare）型態（Krishnan, 2022; Reed, 2008）、強調「無人化」和「資訊化」的第六代戰爭（sixth-generation warfare）型態（Bartles, 2022; FitzGerald, 1994; Slipchenko, 2002）不斷變化的背景下，俄羅斯與中共發起的認知戰完全無視並悖離於資訊倫理學（information ethics, Floridi, 1999, 2013; Floridi & Taddeo, 2016; Moore, 2005; Tavani, 2012）與數據正義（data justice, Dencik et al., 2016; Dencik et al., 2019; Heeks & Shekhar, 2019; Taylor, 2017）等關鍵的戰爭倫理與人道考量，但其獨裁政體近年發動之認知作戰背後戰略意圖，則逐漸浮出檯面。

無視資訊倫理與數據正義考量後，中共更肆無忌憚地採取混合式的手段——利用多方的資訊落差暨媒體傳播管道進行「多模態認知作戰」，企圖影響與改變兩岸民衆信念、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操縱群衆的情感意識行爲，而此舉已造成兩岸整體社會和文化群體相當大的不利影響與衝擊，同時受到全世界各國家密切關注其動向。⁵

威權國家對於民主法治國家的認知作戰目標，基本上舉世皆然，Backes & Swab（2019）指出，俄羅斯針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國）的認知作戰，透過散佈大量的假新聞與陰謀論：

（1）侵蝕了公衆對民主機制的信心；（2）破壞了選舉制度與過程；（3）消弭了民選政府的統治正當性；（4）透過資金扶植親俄政黨與人士，試圖將三國納入舊蘇聯的版圖；（5）分化波羅的海三國家的內部團結，透過挑撥少數族裔與俄羅斯語言族裔的緊張關係，來達成撕裂民族與分化民衆團結的目的。

彙整近年文獻中的國際學術代表性見解，本文指出，目前中共對臺進行「多模態認知作戰」的戰略目標能追溯到其最根本的原始四大意圖，至少有幾點共識並未受到太大的爭議：（1）瓦解臺灣的民主法

治基石；(2) 消弭民選政府與機關的統治正當性；(3) 煽動分化臺灣民衆的團結；(4) 鼓吹無條件投降主義。

有鑒於此，本文倡議以「民主韌性」(democratic resilience) 的概念 (Freidenberg, 2023; Levitsky & Way, 2024; Lührmann, 2023; Lührmann & Merkel, 2023; Shein et al., 2023, December 11; Volacu & Aligica, 2023)，落實應用於我方的反心戰策略，作為抵抗中共認知作戰的重要方法論之一，期許能兼顧理論與實作細節的可操作性，筆者將在後續結論中儘可能詳細說明。本文指出，「多模態認知作戰」已經成為一種中共新興而主流的戰略手段，其核心目標圍繞於影響、操控並控制我方在軍事、政治、經濟決策層面，以及對社會大眾形塑輿論的認知過程，進而達成全面具體統一戰略和階段性戰術的策略。

由表 6 可見，在賴清德當選後，臺灣遭受一連串的「多模態認知作戰」，例如：「攻擊型法律戰」、「偏誤宣傳輿論戰」、「心戰」等。首先是針對在中國工作藝人的強迫要求表態 (2024 年 5 月 22 日) 的輿論戰與心戰，要求其共同在社交媒體上轉發宣揚「反分裂，且不惜武力犯臺宣言」、接續進行「聯合利劍環臺軍演」與相關政治宣傳，涵蓋垂直縱向的「大內宣」；與水平橫向的「大外宣」(依本文論述脈絡與界定，後者較可適當被視作認知作戰的一環)、而後有「五月天事件」

(2024 年 5 月 24 日)、「青島事件」(2024 年 5 月 24 日，國會職權修正案引發之後續社運、連署罷免、新興社交媒體 threads 網路特殊生態)、「成都事件」(2024 年 6 月 14 日，臺灣網紅與自媒體免費赴中國事件遭揭底)以及中共新型的「攻擊型法律戰」：修法臺獨刑度為最高死刑、無追溯期、無需出審 (2024 年 6 月 21 日，並於當天再度寫下最大規模的敵機敵船越過臺海中線之當日紀錄)」等，在多模態框架下較容易恰當理解的延伸認知三戰，同時結合灰色地帶行動 (越過臺海中線) 的事件。⁶

表 6：臺灣遭受的「多模態認知作戰」時間軸

誘發事件	認知作戰類型（模糊地帶之釐清）	戰略目標
2024 年 5 月 20 日 賴清德就任發表之就職宣言： 「（新）兩國論」	多模態認知作戰： 全力遏止「分裂臺獨勢力」	減損統治正當性
2024 年 5 月 22 日 強迫在陸工作藝人表態： 「不惜武力犯臺宣言」	輿論戰、心戰： 「定調兩岸屬於內政問題」與「武力犯臺的合法性」	重申反分裂國家
2024 年 5 月 23 日 聯合利劍—2024A 「東部戰區環臺軍演」	輿論戰、心戰： 「對於『臺獨』勢力的嚴厲警告」 解放軍、國臺辦、(中)外交部、(中)國防部同步聲明	恫嚇軍心民心
2024 年 5 月 24 日 五月天事件： 「我們中國人來北京吃烤鴨」	輿論戰、心戰： 威逼利誘臺灣藝人認同「中共統一」的意識形態	撕裂臺灣歌迷
2024 年 5 月 24 日 青島行動	輿論戰、心戰： 透過立法議題手段達成「極化臺灣」之意圖	國會內部鬥爭
2024 年 6 月 14 日 成都事件： 「臺灣網紅與自媒體免費赴中」	輿論戰、心戰： 「強調中國對臺籍人士之友善」、 「赴中旅遊安全」	民眾自行獵巫
2024 年 6 月 21 日 中共修法： 臺獨之刑度為最高死刑	攻擊型法律戰、輿論戰、心戰： 警告臺灣赴陸或港澳旅遊及工作者， 不得批評中共	遏止反共聲浪

註：（1）「青島行動」為《國會職權行使法修正案》引發之社運，以及後續罷免、社交媒體 threads 形成活躍的新興特殊網路生態等；（2）中共修法臺獨刑度為最高死刑，且無追溯期、無需出審，同時於當天再度寫下最大規模的軍機軍船越過臺海中線之單日紀錄；（3）本表以 2024 年 5 月至 6 月時事演示本文延伸三戰理論的實例。

從上述事件整理出中共相關的「多模態認知作戰」，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認知作戰其實涵蓋了本文所提及的「攻擊型法律戰」、「（偏誤宣傳）輿論戰」與「心戰」，並可以具體區分各項事件遭受認知戰的類型與戰

略。本文歸納出中共近期針對當前臺灣民主社會發動具有無形性、持續性、滲透性的多模態認知作戰的幾個主要目標正是要：(1) 削弱社會凝聚力；(2) 操縱公眾輿論；(3) 破壞對政府機構與民主制度的信任；(4) 使社會極化加劇；(5) 對於事實與真相的理解產生嚴重分歧。

賴政府接棒後，我們可以發現上述五點持續在發生，例如：國會職權修正案、五月天事件、青島行動、成都事件等，都至少涵蓋了兩個以上遭受認知戰目標攻擊的痕跡。

本文從跨領域傳播語言學取徑(Beaman, 2024; Bryden et al., 2018; Monaghan & Roberts, 2019; Tamariz & Kirby, 2016) 作為出發點，來理解過往文獻中未提及到中共特殊的「多模態認知作戰」型態，並儘可能深入淺出解析自賴政府上任後，中共一連串對於臺灣網路攻擊、灰色地帶(作戰)行動、攻擊型法律戰、輿情戰對於現階段臺灣面臨多模態認知作戰的影響。主軸時序將從 2024 年賴清德的勝選感言如何接續李登輝與施明德等人的「(準)兩國論」，到上任後賴清德的「(新)兩國論」，導致中共開始進行大外宣與大內宣，強逼施壓臺灣赴中國演藝工作者表態支持收復臺灣領土，重申反分裂國家法。例如 King et al. (2017) 指出，透過對社交媒體和網路使用者空間的大規模監控與操縱，可影響海內外公眾輿論和政治決策的正當性。

隨著 AI 技術的持續進步，無論認知作戰在中國境內外的實施，中共的官方勢力都強力運用多模態認知作戰的手段和策略，來不斷地演進和更新其影響範圍。同時，AI 作為當前的技術革新重大進展，不僅改變了第六代戰爭的面貌，也為認知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這種 AI 技術的軍事應用與認知作戰應用，使得中共敵對勢力能夠更加精準地定位，並影響海內外的目標群體，從而提高其認知作戰策略的可控管性與效率性。這不僅凸顯了我國長期處於中共侵臺戰爭邊緣的嚴峻現實，更加迫切地突顯了制定和實施有效反制認知作戰策略的重要性。本文指出，為了有效地抵禦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我方必須從多個層面加強我們的防禦能力和反制能力，來建立並增強臺灣的民主韌性 (building/enhancing resilience, Backes & Swab, 2019; Cao et al., 2021)，具體內容與目標如下：

一、臺灣必須提高對中共認知作戰的識別和分析能力，並及時揭

露和反駁其所散佈虛假歪曲的爭議資訊。這方面的研究表明，對於虛假資訊與假新聞的識別和反駁是一項複雜且挑戰性的任務，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技術和方法（Chan et al., 2017; Khan et al., 2022; Kim et al., 2021）。

二、臺灣必須加強自身的認知安全和抵抗力，並培養我們對資訊來源和內容的批判思考能力，藉由多元且新穎的方式提高公眾的媒體素養和批判性思考能力，對於抵禦認知作戰與降低假訊息的風險至關重要（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19）。

三、在「後真相（post-truth）」時代中，要透過跨學科的技術認知（technocognition）研究誤導訊息、假新聞和爭議訊息時，臺灣必須建立一個有效且協調的跨部門、跨學門、跨國際夥伴的反制機制，並將此議題放置於更宏觀的科技社會背景中來考慮這些問題（Choraś et al., 2021; Lazer et al. 2018; Lewandowsky et al., 2017; Tsipursky et al., 2018），且須利用各種媒介和平台，積極宣揚我們的民主法治理念和核心價值，同時，在跨學門與跨領域層面，綜合心理學、政治學、社會科學等方面發展一個新的跨領域傳播語言學研究取向。

四、臺灣必須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和國防研究人才培育，並加強我們在 AI 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相關方面的研究強調了 AI 與區塊鏈技術在提高防堵偏誤宣傳輿論戰、假新聞和其他類型認知戰方面的能力（Santos, 2023; Shae & Tsai, 2019; Westlund, 2022）。

五、本文也建議我方參照中共與美國使用 AI 與其他新興技術，發展一套融合戰略與戰術目標的對策（Rim, 2023）。舉例來說，中共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正在發展人工智慧創新能力，並試圖將 AI 及即時語言判讀系統，有效地融入武裝力量，該戰略支援部隊負責整合多種「戰略功能」，其中包括資訊領域和有效整合人工智慧，這可能決定未來衝突中的勝負（Rashid et al., 2023; Vogel et al., 2021）；又例如，美國 AI 開發商 Scale 公司已將新開發的 AI 軟體「Donovan」交付美陸軍第 18 空降軍，進行情報分析測試。這套系統運用「大型語言模型」和

「人類回饋強化學習」技術，能夠一次快速處理高達十萬則行動命令及情蒐報告等即時訊息（De Vynck, 2023, October 22）。

六、臺灣必須堅定不移地捍衛我們的國家主權和國防安全利益，擬定務實政策提升國際形象與國際參與，並與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Cho & Ahn, 2017; Jie, 2012; Swaine & Mulvenon, 2001）。藉由專業的研究人才，從國家安全與國防的角度評估混合戰的影響，並分析認知戰操作的層次與攻擊策略，提供相關的反制對策，惟有如此，臺灣才能有效地抵抗中共的認知作戰；藉此來保障我們的民主法治和核心價值不受侵蝕和破壞。本文認為，這會是臺灣發展「民主韌性」的長期戰略的核心目標。

本文針對「多模態認知作戰」模型的研究，可以更有效理解中國如何透過媒體戰爭影響其他國家，結合中共四種介選與其他模式的認知攻擊，在臺灣民主政治運作下定期兩年一次的選舉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所謂的「多模態」（multi-modal）／「多模態傳播」（multimodal communication），意指迅速發展的科技令認知作戰「攻擊管道」或「傳播媒介」具有多元性、泛用性、以及其交叉使用的多方效應，亦同時包含本文先前簡述中共多模態認知作戰水平傳播的以下四大特徵：（1）「內容形式多樣化」、（2）「交互性增強」、（3）「生動化形象」、（4）「跨媒體融合」。同時，在國家政府集體層面、軍事新聞單位層面、相關企業及利益關係團體層面、乃至公民與國民個人層面，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以不同傳播媒介所造成的偏誤宣傳輿論戰與心戰影響，意圖導致臺灣各方能動者的集體機關失靈現象或產生決策偏誤的情況發生，例如：錯估開戰的可能性、擬定錯誤或不利於我方的戰略政策、誘使我方執行被誤導的戰術目標。而本文首將此四大特徵，合併入先前曾討論過的四種認知戰模式，示例如何以多模態框架來理解不同認知作戰模式的水平傳播特徵，來拓展與深化既有文獻理論較未觸及的傳播學面向，如表 7：

表 7：四種認知戰模式的多模態傳播特點

	內容形式多樣化	交互性增強	生動化形象	跨媒體融合
外宣模式	✓			✓
粉紅模式		✓	✓	
農場模式	✓	✓		
協力模式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與整理。

第一，「外宣模式」利用「內容形式多樣化」和「跨媒體融合」來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的政策和立場，塑造正面國家形象。這一模式通過多種媒體平台，如新聞、電視和社交媒體，傳遞多樣化的內容，同時在不同媒體之間進行融合，擴大其資訊傳播的覆蓋面

第二，「粉紅模式」主要依賴「交互性增強」和「生動化形象」，透過社交媒體上的政治狂熱粉絲和網民，以「生動化形象」和故事化的方式，傳播反分裂國家政策，並對外批評進行反擊 (King et al., 2017)，同時，這些交互互動性增強的內容，通過強烈的參與感和情感共鳴 (Paul & Matthews, 2016)，可以達到更佳的傳播效果。

第三，「農場模式」則結合「內容形式多樣化」和「交互性增強」。通過與互聯網（網際網路服務）企業合作，製造大量網路水軍和假新聞，對外與對內傳播中國的政策和立場。這些內容形式多樣化的假新聞和資訊，通過高度的互動性，迅速擴散並影響輿論。

第四，「協力模式」體現了「跨媒體融合」和「生動化形象」，讓無關人士協助散布假訊息或爭議消息，擴大其傳播範圍 (沈伯洋，2021；秦宛萱，2020 年 3 月 18 日；Chen & Gao，2022 年 9 月 30 日)。例如，利用知名影視知名電影《神力女超人》女主角演員蓋兒加朵 (Gal Gadot) 在其 Instagram 帳號上分享中國《新華社》的內宣新聞 (秦宛萱，2020 年 3 月 18 日)，以生動的形象吸引大量受眾的關注，並通過與在地協力者或其他國家個人和組織的合作，進行跨媒體融合的傳播，達到廣泛的影響力。透過與臺灣的「在地協力者」或其他國家個人和組織合作和結盟，對外傳播其一個中國政策和反分裂國家法不排除武統臺灣的立場、抑或假冒海內外普通國民傳遞對臺灣執政「當局」的不滿，從而試圖獲得外界與其友邦的支持和認同。

臺灣自全面直選施行至今的近二十多年來，中共逐年加強在介選上的認知作戰，這種策略被視為有效降低對臺統一或侵略成本的滲透戰略（松田康博，2021）。對於中共來說，能夠順利統一解放臺灣最低成本的方式，即是大幅干預臺灣的定期大選（又稱「介選」），藉由金援或招待來獲得臺灣「在地協力者」的幫助，選出紅統派的總統、官員、立法委員、議會民代、里長（朱鳳治、吳其昌，2023年12月20日），透過改變臺灣的憲政法治結構基礎，達成「加速祖国统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而即便最終中共還是需要採取有限度武力收復臺灣的手段，也可以透過影響臺灣當局的主要政策，使我國政府大步在社會政經層面讓利中共、減少與國際聯盟的軍事合作、降低國防預算及降低軍事抵抗的意願與能力，再透過心戰與偏誤宣傳輿論戰操縱懼戰與拒戰投降的民意，進而使武力犯臺的軍事成本降至最低。

中共對臺進行偏誤宣傳輿論戰與認知戰的事實、以及相關認知傳播過程的具體證據，在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Taiwa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IORG）的研究下，也被美國在臺協會 AIT 發言人孟雨荷（Amanda Mansour）在 2020 年所認證背書（Chris, 2020）；瑞典哥德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 V-Dem」之民主報告亦指出，臺灣遭逢境外假資訊攻擊長年位居世界第一（Nord et al., 2024）。而為了應對中共的認知戰，臺灣也需要加強自身資訊安全和網路防禦能力。意即，臺灣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資訊安全國防體系，確保政府、軍隊和企業的資訊系統不受到外部的攻擊和滲透。在資訊相關的硬體工程方面，臺灣需要加強自身的網路防禦能力，確保我方網路基礎設施不受到外部的破壞和攻擊。此外，在防堵中共的銳實力方面（Brady, 2017, September 18; Cardenal et al., 2017; Diamond & Schell, 2019; Nye Jr, 2018, January 24; Walker & Ludwig, 2017, November 16），除了資訊安全國防體系結合 AI 技術的應用以外，臺灣還需要加強自身的資訊安全教育和公眾媒體識讀（Paul & Matthews, 2016），提高民衆的資訊安全意識和防範能力，以應對中共的超限戰、多模態認知作戰攻擊。同時，本文忝認為引介跨領域的多層次傳播語言學分析取徑，未來在臺灣發展民主韌性以因應多模態認知作戰的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故本文提供一套目前在認知作戰研究文獻中較為罕見語料實作分析方法的簡易示例，希冀後續可供學術、智庫或軍情研究認知作戰若干可能的方法

學取徑。

伍、多層次傳播語言學框架的方法學初探與簡易實作示例

關於中共認知作戰的傳播路徑分析，在粉紅模式與農場模式上，King et al. (2017) 利用溯源分析，在語料中藉由關鍵詞分析找尋傳播網路路徑示例，估計中國政府每年製造並發布約 4 億 4800 萬條社交媒體評論，這些社交媒體評論主要目的與意圖是分散公眾的注意力並改變話題。中共利用這種「偽裝草根」的策略，秘密發佈大量偽造的社交媒體評論，並偽裝成是普通中國網民的真實觀點，藉此來引導公眾輿論的趨勢與走向。大多數這些帖子（貼文）都是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或其政權符碼打氣。實際上，這些「帖子」的發布者實際上並非一般民衆，而是具有中共公務員身分的網軍。其行動時間點在於，重大事件發生、某個社會議題延燒、甚至引發不滿或質疑的聲浪發生時，中共就會利用「偽裝草根」的策略，發佈大量偽造的社交媒體評論。研究還發現，這些公務員並未收到任何「稿費」，這些發文亟可能就是他們原本的工作內容，且每年四億多的貼文有一半發表在政府網站，其他的則被送到七億網民活躍的社群媒體，受到五毛黨出沒影響的網站包括《騰訊》、《新浪》和《百度》。

King et al. (2017) 在數據搜集層面上首先收集了大量的社交媒體貼文。他們在 2014 年 12 月獲得了一份由匿名博主 xiaolan 發布的文檔，該文檔包含了 2013 年和 2014 年間章貢地區網宣辦賬號收發的郵件。這些郵件揭示了網路評論員的活動，包括大量的五毛言論。由於這些文檔數量龐大、結構複雜，他們發展出了一種方法和流程，需要從大量的人工編碼，到自動化的文本分析和抓取，使得這些資料變得結構化和較易於讀取。而這也正是本文建議我方政府單位與情報研究單位建置大型語料庫與大型語言模型，俾利於後續分析的緣由。

同時，進行自動化文本分析後，目前國內外文獻皆未明確提供，

本文後續原創性針對認知作戰語義場與敘事框架的 WordVec2 語義場向量分析，意即，在進行自動化文本分析後，亦可加入本文原創語義場關聯詞共性義素 (semes) 分析作為參考依據方法，並考量其共通義素 (common semes)，共通義素意謂其在語義場分析中，多個詞彙共享的最小意義單位 (表 8)。這些義素是詞彙意義的基本構成部分，通過共享這些義素，詞彙之間可以建立關聯和區別 (Ataboyev & Turgunova, 2022; Dullieva,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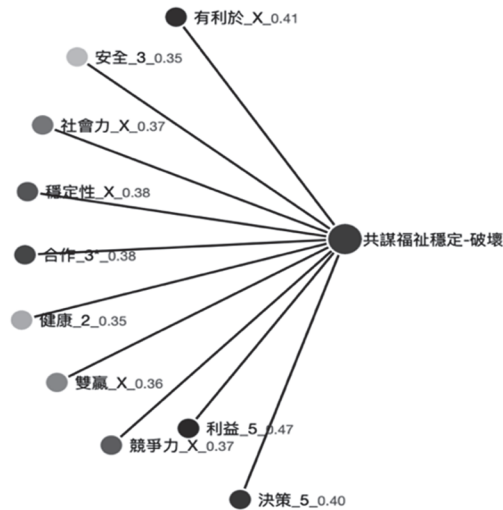
表 8：共性義素與共通義素之差別

特徵	共性義素 (semes)	共通義素 (common semes)
定義	詞彙意義的最小單位，構成詞彙意義的基本要素	多個詞彙所共享的共性義素
語義特徵	可以是具體或抽象的，包括區別詞彙意義或共有的特徵	反映多個詞彙之間的語義關係和系統性
涵蓋範圍	針對單個詞彙或一組詞彙內的特徵	涵蓋涉及多個詞彙的共有特徵
語義層次	更基本、更微觀的語義單位	更宏觀的語義關係，涉及整個語義場或概念領域
主要區別	基本構成要素，可區別或共有	跨詞彙的共有特徵，體現詞彙間的關係和系統性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與整理。

本團隊前期係先透過簡易編程的文本探勘方法，蒐集 2021 年至 2024 年間〈國臺辦新聞稿〉、《中國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等之公開語料，而後擷取高頻詞彙並使用開源軟體進行 WordVec2 語義場分析 (semantic field analysis)，探討語義場中的詞彙共享某些共同的語義特徵暨其區別性語義特徵，展現不同詞彙在傳播語言網絡當中的語義場中具有何種區別性語義特徵，並透過量化共性義素的方法，讓語素在意義上關聯被具體數值呈現。共通義素可以是詞彙的某類語用共同特徵參考，這些義素可以是多個詞彙的共同特徵，從而構成一個語義場，如圖 1。

圖 1：語義場關聯詞分析：「統一」的正面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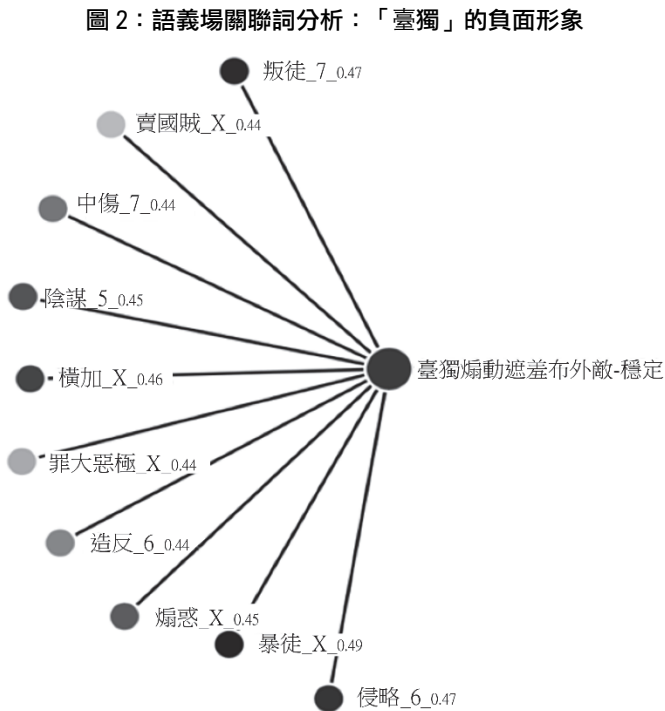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分析與製作（蒐集時間：2021 至 2024）。

圖 1 顯示中共在進行認知戰時，所偏好選擇的詞彙其關聯語義場與共伴詞頻指數，且其結果具有足夠信度可被重複性施作的一致性。由下列語義場關聯圖由筆者擷取相關資料自製，在兩張關聯圖當中可以發現，中共媒體在其宣傳材料中，試圖用「共謀」、「福祉」、「穩定」等高頻詞彙，導向共通義素「利益」（0.47）、「合作」（0.38）、「競爭力」（0.37）、「雙贏」（0.36）、「安全」（0.36）塑造中國統一正面形象的詞彙，來降低中共統一武嚇臺灣的對人民產生的排斥觀感作用，並試圖提高臺灣民意對於統一的好感與接受度。

反之，由圖 2 可見，面對臺灣執政黨堅決維護主權尊嚴與國際民主夥伴結為同盟時，中共慣於使用「臺獨」、「煽動」、「遮羞布」、「外敵」等高頻詞彙，關聯到共通義素「暴徒」（0.49）、「侵略」（0.47）、「陰謀」（0.45）、「賣國賊」（0.44）等負面破壞臺海穩定的形象，藉機來對外宣傳「臺灣屬於中國內政問題」的一個中國框架。本研究透過具有重複可施作信度之量化的共通義素語義場分析方法，其使用不同大型語料庫之分析結果皆在統計誤差值內，將中共認知戰高頻詞彙，分解為最小的語素意義單位，從而展示中共認知戰敘事詞彙框架之間的系統性關聯，結果顯示出，中共當局意圖以武力恫嚇攻佔臺灣與發

起戰爭的合法性，並將破壞兩岸和平的責任歸咎於我國，藉此加強其宣傳環島軍演與共機侵入我方航空識別區的法理正當性。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分析與製作（蒐集時間：2021 至 2024）。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認知作戰不僅僅是針對臺灣，它還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東南亞、澳洲、歐美），試圖透過多模態認知作戰來達到其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目的（Benner et al., 2018; Hamilton, 2018）。爲了有效地應對中共的認知作戰，國際社會需要加強合作，共同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以確保資訊安全和網絡防禦。此外，AI 技術在認知作戰中的應用也帶來了新的議題與挑戰，例如，AI 技術可以被用於分析和預測敵方的認知作戰策略和手段，從而提前做好防範和應對。同時，AI 技術也可以被用於加強我方的認知作戰能力，透過分析和利用敵方的認知弱點，進行有效的心戰和輿論戰。而爲了有效地應對認知作戰的威脅和挑戰，臺灣需要進一步地制定和實施有效

的策略和措施，留意 AI 技術被敵方用於進行大規模的網路監控和數據分析，從而避免讓我方公民個人隱私和自由權利受到威脅，以確保在 AI 時代下的資安國防禦能力得以與時俱進。

應對認知作戰中，整併語料庫分析方法再透過分析不同語體（genres）和語域（registers）（Biber & Conrad, 2009; Gabrielatos & Baker, 2008），可以用來識別和分析中共宣傳材料中的語言特徵和模式。本文針對 2024 年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四日後，5 月 24 日的五月天演唱會事件，後續中共官方新聞與社群媒體宣傳之語體和語域分析法進行示例。

表 9 展示本文對中共宣傳材料進行的語體特徵分析，重點比較了「新聞」語體特徵和「正式」語體記號，其類屬於不同敘事框架架構中的示例。本文選取了一段來自《新浪網》（長安視察，2024 年 5 月 27 日）的原始語料，（見附錄一），並以此為基礎分析其語言結構和操作方式。在新聞語體特徵中，本文首先著重分析其「時空架構」，觀察到其強調近期事件的描述，這表現出新聞報導對時效性的重視。接著是「觀點架構」，其特徵是客觀敘述，即新聞報導通常以客觀的角度呈現事實，而非加入主觀評價。最後，「意圖架構」反映了其事實展現和事實描述的特點，新聞語體往往注重事實的呈現和描述，以增加可信度和權威性。在「正式」語體記號方面，「時空架構」使用了時間標記（近日），這一語體特徵明確標示事件發生的時間，使讀者可以清晰了解事件的時間背景。「觀點架構」則使用描述性用語（引發），這種語體特徵側重於描述事件的影響和結果，通常帶有一定的引導性和指示性。「意圖架構」則著重於確立權威性（全場），這種語體特徵通常用於正式場合或官方聲明中，以強調資訊的權威性和正式性，增強讀者對資訊的信任。本表透過分析特定事件後中共官方新聞與社群媒體宣傳的語體特徵，展示了不同語體在外部模式和現實模式中的語言表現和操作方式，從而幫助本文識別和分析宣傳材料中的語言特徵和模式。這種分析方法在應對認知作戰中尤為重要，因為它能揭示宣傳材料的深層結構和意圖，有助於更好地理解 and 應對宣傳攻勢，且此種分析必須有應用語言學專家團隊才得以進行合適的分析。

表 9：中共宣傳材料語體實證分析

原始語料	近日，台湾乐队五月天在演唱会与观众互动时，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引发全场欢呼。而这一幕却让岛内某些人「破了防」，比如赖清德就以一句「盼民众谅解」试图挽尊，结果遭到群嘲。				
	語 言 材 料 呈 現 模 式				
類屬架構		時空架構	觀點架構	意圖架構	
	「新聞」語體特徵	最近事件	客觀敘述	事實闡述	
		「正式」語體記號	描述性用語	確立權威性	時間標記
				(引發)	(全場)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分析與製作（蒐集時間：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7 月）。

表 10 中，本文分析中共宣傳材料在不同語域中的操作模式，並結合中共認知作戰的四大意圖來解釋其策略。首先，大眾媒體語域主要針對公共事件，例如五月天的演唱會，通過報導觀眾與網友的反應來引發社會情感的共鳴和互動。這一操作方式實現了中共認知作戰中「煽動分化臺灣民衆的團結」的意圖，因為社會反應中涵蓋的撕裂情緒，容易引起不同群體間的分歧和對立。在政治語域中，選取賴清德呼籲體諒「在他人屋簷下的臺灣藝人」這一政治事件，重點強調大眾對五月天事件的不解與憤怒，這體現並佐證了中共認知作戰中「消弭民選政府與機關的統治正當性」的意圖。藉由通過放大民衆的不滿和負面情緒，意圖削弱臺灣民選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文化娛樂語域則選擇了「我們中國人」言論，並分析了其在娛樂圈引發的反應，特別是對「青島行動」中五月天粉絲的分化。這一策略同樣效力於「煽動分化臺灣民衆的團結」的認知作戰意圖，在娛樂圈內引發的爭論和分歧可以進一步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削弱臺灣民衆的團結；並試圖透過文章強化環臺 2024A 聯合利劍軍演的法理正當性。

綜合來看，透過分析中共宣傳材料如何在不同語域中，運用特定的策略和內容特徵，可以釐清其在此事件中進行多模態認知作戰的四大意圖。這些策略通過操控媒體報導、放大社會情緒和分化群體，來達成其撕裂臺灣民衆情感的政治目標，進一步削弱臺灣的民主法治基石和民衆的團結。本文也藉此表，初步示例多重語域的分析方法如何有助於揭示中共宣傳材料的深層結構和意圖，以政戰傳播與民主韌性

的和平關懷，期許拋磚引玉，讓更多國內外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們，互相結合跨領域專業，從而更好地應對和防範我國正遭逢認知作戰的嚴重挑戰與威脅。⁷

表 10：中共宣傳材料多重類屬語域分析

類屬語域	大眾媒體語域	政治語域	文化娛樂語域
內容特徵	公共事件：五月天的演唱會	政治事件：賴清德呼籲體諒	文化類事件：我們中國人言論
	社會反應：觀眾與網友反應	大眾反應：民眾不解與憤怒	娛樂圈反應：分化五月天粉絲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分析與製作（蒐集時間：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7 月）。

陸、結論：傳播語言學對策暨民主韌性理論因應多模態認知作戰

本文重新審視過往對認知戰的理解，並提供初步發展後的分析與建言，在應對中共認知作戰時，政治社會學、語料庫語體判別、心理學等跨領域方法學可以相互結合，並期望在臺灣民主法治基礎下，展現對個人和群體權利的尊重，展現我國的民主韌性。具體來說，筆者建議，我們在面對中共認知作戰的挑戰時，可以結合本文傳播語言學的方法，發展出一套新型態的研究與應對策略。這套對策不僅涵蓋了對中共統戰認知作戰宣傳材料的深入分析，還包括了一系列的實際應用和策略，以確保有效地應對和抵制中共的認知作戰。

首先，我方可建立一個多層次的宏觀與微觀語言分析框架，這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框架應該包括不同微觀層面語言使用特徵的全面分析，如語體體裁、詞彙選擇、語法結構和語用特徵（Bawarshi & Reiff, 2010; Bhatia, 2014; Biber & Conrad, 2009）；以及宏觀層面的批判話語分析，如話語霸權、意識形態的揭露、參與式行動研究、社會文化脈絡、跨組織現象分析（Fairclough, 2013; Gee, 2007; Gibson-Graham, 2006; Musolff, 2008; Purwanto, 2008）。⁸此外，多層次框架還能夠涵蓋

對宣傳文本材料中情感和認知策略的分析（林萱柔等，2023；傅文成、陳怡全，2023；Shen et al., 2022），以及對敘事結構、社會因素和故事情節的分析（Baker, 2006; Berendt, 2011; Hansen & Machin, 2018; Herman, 2017; Mayer, 2014）。

第二，發展一套快速反應機制，是應對突發宣傳攻勢的關鍵。這包括透過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一個專門的語言分析團隊，迅速收集和分析新出現的宣傳材料此外，利用先進計算機方法輔助的語料庫技術、計算語言學、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NLP）工具，來分析文本中單詞和語法模式（Just, 2024; Khurana et al., 2023; Stubbs, 1996），加快分析過程、並提高反應的時效性和準確性。第三，進行文化和語言背景教育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由於文化和語言差異，可能導致我方對中共宣傳材料的誤解（反之亦然，中共對臺認知戰時，可能因誤解我方的文化與語言背景而暴露其身份），因此進行相關的文化和語言背景教育是必要的。這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和分析中共政治宣傳中的隱喻和情感比喻，其中涵蓋的隱喻概念系統性、方向性隱喻、本體論隱喻等（Cienki, 2008; Kövecses, 2002, 2003; Lakoff & Johnson, 2008; Otieno et al., 2016; Alvesson & Spicer, 2010; Thompson, 2018），如何常常在未被察覺的狀態下，塑造了我們對政治事務與政治行動的看法。

第四，面對認知戰時，跨領域多學科的合作機制是關鍵且必要的。除了綜合社會學和語言學的批判話語分析，多層次分析框架也需要與科學、心理學、人類學、資訊管理、政治學和媒體研究……等其他學科相結合（Blommaert & Bulcaen, 2000; Claverie & du Cluzel, 2022b; Chouliraki & Fairclough, 2021; McAllister & Nelson, 2013），可涵蓋問卷與民意調查瞭解與評估輿情（孫懋嘉，2023），以獲得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這種跨學科的合作可以提高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度，從而提高反制對策的有效性。第五，在臺灣民主法治的社會下，重視道德和倫理考量必定是不可或缺的。在進行語言分析和制定對策時，仍然必須審慎考慮到公民個人隱私和言論自由的保護，研究者也應避免將分析純粹用於選舉意識形態操作，保持分析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心繫國人國防安全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本文最後主張，應對認知戰時，勢必討論如何整併「民主韌性」理論取徑的主要原因之一。⁹

綜上所述，傳播語言學對策的實施，需要一個多層次、快速反應、文化敏感、跨學科合作和道德倫理考量的綜合框架。本文期許，透過這樣的框架進行發展，我方可以更有效地應對和抵制中共的認知作戰，亦可進行公私協力結合資訊查證平台（Backes & Swab, 2019），例如：「臺灣事實查核中心（Taiwan FactCheck Center, TFC）」、「臺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麥擱騙（MyGoPen）」、「真的假的（Cofacts）」等多樣化平台的資訊查證合作管道，來保護公眾輿論免受到境內外敵對勢力的資訊操縱和多模態認知作戰的負面影響，並容或在未來結合傳播語言學分析方法，作為我方因應中共多模態認知作戰的新堡壘。最後，本文倡議以「傳播語言學」方法，結合「民主韌性」理論（Freidenberg, 2023; Levitsky & Way, 2024; Lührmann, 2023; Lührmann & Merkel, 2023; Shein et al., 2023, December 11; Volacu & Aligica, 2023）取徑，會是我方抵禦多模態認知作戰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論資源。這是有鑒於多數「民主韌性」理論基本上皆有七項核心概念：

- 一、面對敵對勢力威脅的適應能力：民主韌性理論普遍強調民主制度和社會在面對各種挑戰和威脅時的「適應」和「恢復」能力，亦可參見 Shein et al.（2023, December 11）對於民主韌性「準備→回應→恢復→轉型」作為動態過程不同階段的討論。這包括應對內部和外部的壓力，如：極端主義、假新聞、經濟危機等問題，具體案例有 Morlino & Raniolo（2017）詳述了「經濟危機」對於「南歐民主韌性」所造成影響討論。因此，「適應」和「恢復」的能力，無庸置疑是透過「民主韌性」抵禦多模態認知作戰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Lührmann & Merkel, 2023; Poyet et al., 2024）。
- 二、多層次的概念：民主韌性通常被視為一個多層次的概念，涉及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多個方面（Lührmann & Merkel, 2023）。例如，影響拉丁美洲民主制度的各種因素，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挑戰，以及這些拉美國家如何克服這些挑戰來維持民主制度的穩定性與民主韌性（Freidenberg, 2023）。同樣地，針對臺灣的民主韌性研究，勢必也會涵蓋了

地緣政治、市場機制、人口轉型、政府治理和公眾溝通等多個領域。

- 三、強調民主與法治制度的建設：大多數民主韌性理論都強調「建立」和「維護」強大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Levitsky & Way, 2024)，涵蓋 Poyet et al. (2024) 芬蘭、Chiva (2023) 羅馬尼亞的案例、及 Alexseev & Dembitskyi (2024) 烏克蘭的案例；涵蓋建立健全的法律體系、有效的政府治理機制和透明而堅韌的公眾溝通策略 (robus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ao, et al., 2021)。
- 四、重視公民參與：民主韌性理論普遍認為，積極地鼓勵公民參與是維護民主的關鍵。這包括鼓勵公民社會的發展，促進公眾對政治過程的參與 (Hsu, 2024)。
- 五、關注友善的資訊環境：在當代大數據時代，民主韌性理論特別關注資訊環境對民主的影響。民主韌性理論探討了如何應對假新聞、資訊操縱等挑戰，以及如何利用大數據技術增強（而非削弱）民主韌性等問題，實施促進社會凝聚力 (promoting societal cohesion) 的政策計畫，以維護民主和諧社會的穩定性 (Backes & Swab, 2019; Cao, et al., 2021)。
- 六、強調國際合作：民主韌性理論明確的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增強民主韌性，勢必會需要國際合作。例如，臺灣（已）可致力於發展成為世界半導體、再生能源等領域，成為國際盟友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以增強我方的民主韌性 (Backes & Swab, 2019; Cao, et al., 2021)。
- 七、關注社會公平正義與包容和平：民主韌性理論普遍認為，社會公平和包容是民主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韌性理論探討了如何應對不平等、社會矛盾等問題，實施促進社會凝聚力的政策計畫，以維護民主和諧社會的穩定性 (Backes & Swab, 2019)。

結合以上民主韌性理論的主要共通點，本文結論綜合傳播語言學到民主韌性理論，從個人、社會、國家層次，建議容或可發展以下可動態調整之舉措方針來抵禦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

- 一、強化媒體識讀能力：提高公眾對媒體和資訊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是關鍵。通過教育和培訓，幫助民眾辨識不實資訊，提高對認知戰術的警覺性；加強批判性思維和媒體素養技能，增強個人識別和抵抗操控的能力（Cao et al., 2021; Claverie & du Cluzel, 2022b）。
- 二、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制定相關法規，規範社交媒體平台，打擊假新聞和不實資訊的傳播（Claverie & du Cluzel, 2022b）。
- 三、促進公民參與和社會凝聚力：鼓勵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增強社會凝聚力，減少社會分裂，提高對外來影響的抵抗力。
- 四、加強跨部門軍民合作：政府、軍方、學術界和民間組織等多方合作，共同應對認知戰的威脅（Cao et al., 2021; Lin, 2023）。
- 五、軍民共同發展心理韌性訓練：借鑒軍事心理訓練的經驗，幫助民眾建立心理韌性，提高對於偏誤宣傳輿論戰的抗壓能力（Cao, et al., 2021; Claverie & du Cluzel, 2022b）。
- 六、維護資訊環境的透明度和多元性（Backes & Swab, 2019）：確保資訊來源與其管道的多樣性和可靠性，維護最低管制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防範有害的「社會性破壞技術」所產生的言論資訊傳播，並開發早期警報系統來檢測和監控認知戰活動（Cao, et al., 2021）。
- 七、加強國際合作：其他民主同盟國家分享經驗和資源，跨國共同應對多模態認知戰威脅（Backes & Swab, 2019; Cao, et al., 2021）。
- 八、提高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通過有效的立法治理和行政程序的高度透明度，增強公眾對我國民主制度的高度信任和支持（Hsu, 2024）。
- 九、發展反制技術：運用 AI 等複雜先進技術，提高對認知戰術的識別和應對能力，並利用人工智慧和數據分析來檢測和對抗認知戰行動（Cao et al., 2021）。
- 十、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加強對關鍵資訊系統和基礎設施的保護，防範可能的大量網路攻擊和干擾，並發展安全且具韌性的通訊管道，以保護免受網路和資訊攻擊（Cao et al., 2021）。

本文所提供的上述方法僅為諸多方法中的概略參考指南。臺灣試圖抵禦中共的多模態認知作戰，不僅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從個人到國家層面都要提高警惕，缺一不可，也須建立更多精細層次的防禦機制。同時，要在保護公民自由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尋求平衡（Claverie & du Cluzel, 2022b），時刻警惕在兼顧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務須避免損害臺灣社會和諧共榮、以人為本之核心精神。¹⁰總結回應：「認知作戰是否正恰巧擊中臺灣作為自由民主國家之弱處」？綜合全文所探之範疇，答案明顯為否。事實上：「我們不僅可以，且應該對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民主韌性深具信心」。

註釋

- 1 有鑒於在政治傳播領域中，水平傳播指「同級別政治主體」之間的資訊傳遞，其傳播要素大致上涵蓋權力關係平等（無上對下關係）、發生在同一層級之間的交流；故在「認知作戰」置於政戰傳播脈絡來討論時，本文將「認知作戰」限定於「（準交戰）同級別敵對勢力或敵對政體」之間的用法，應不至於導致過度限縮或過度引申沿用的問題。本文初步明言，多層次傳播語言學分析框架於長期反制多模態認知作戰中之重要性，尤其語義場向量分析於未來學術與軍事戰情研究，可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時代背景下被進一步拓展應用至大型語料庫計算語言學層面上。本文簡易示例與列舉之可能方法學，如：語料庫研究、語體與語域之分析，皆有跨領域（如：電腦科學、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結合之潛力，並且可供有志於此之量化研究者進行具有外推性之後續延展，符合近年學術研究之趨勢以及國家發展規劃之方針。最後，本文匯合實踐考量，初探傳播語言學結合民主韌性理論的未來展望，期許於當前中共嚴正威脅下，提供部分可動態調整之政策方略，後續冀供政府與學者參考與進一步深化研究，共同捍衛臺灣之民主韌性。
- 2 水平傳播（horizontal transmission）」此一術語在不同脈絡中有其多樣化的使用與意涵。而在政治傳播學領域，「水平傳播」通常能

指或所指「『同級別政治主體』之間的資訊傳遞」。而「認知作戰」不僅是「政治傳播」，更是「政治傳播」中子類的「政戰傳播」；其固然具有政治傳播或政治宣傳的面向，但卻不能直接與政治宣傳畫上等號，而須更加謹慎的探討其定位或定義。有鑒於此，本文主張：「『政戰上同級別政治主體間的水平傳播』是認定『認知作戰』的核心必要條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同級別政治主體間」雖常指涉「國與國之間」，但並不總是必然如此（如：極端武裝組織），因其亦有涵蓋「敵對非國家行為者」的可能性。雖然本文探討的是「中共對臺認知作戰」此一事實應當如何理解，但同時仍強調「認知作戰」應被嚴謹定義為「同級別政治主體間的政戰水平傳播」。政戰上「認知作戰」的水平傳播雖然通常發生於「敵對關係之國家主體」，但更準確的說法，仍係描述為「同級別的敵對政治主體」較為準確，其敵對關係至少反映於軍事、政治、外交上的競爭與對抗。現階段中共對臺之認知作戰，具有本文指出之多模態水平傳播特徵，其令資訊真實性更難以辨別、操縱敵對政治實體（臺灣）之決策與民意、加劇民衆誤解和衝突、具有強烈實體侵略之意圖，故中共應可被認定為「同級別的敵對政治主體」而無太大爭議；且其確實為臺灣的國家安全與民主韌性帶來嚴重的衝擊與挑戰。針對此，本文倡議臺灣更需共同團結一致，堅守自由民主體制之的多元價值，且認知作戰議題不該流於國內意識形態立場上的炒作與針鋒相對，而應儘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不同民衆的政治認同與表達意見，以彰顯臺灣民主韌性兼容多元意見之寶貴真諦。

- 3 某些認知作戰確實涉及政治宣傳中的內外宣，但本文並不將所有中共「政治宣傳」皆視為「認知作戰」。本文在學理上亦儘可能將符合「政戰水平傳播」與「多模態認知作戰戰略意圖」之語料，視為「高度可能」的給定材料；緣由在於，現今中共對臺認知作戰，不僅已難明確區別「政令或政治宣傳」與「認知作戰」之間的界線，且認知作戰的組織與其具體金流，除國安情報與檢調單位以外，基本上難被外界掌握。話雖如此，本文仍嘗試在「水平傳播」（同級別政治實體間）與「垂直傳播」（國家與人民間）做出學理區分，並期許此區分足夠明確，得以避免我國過去討論認知作戰議題時，容易引發「社會極化」與「獵巫在地協力者」之現象。實務上，以

認知作戰社會破壞型技術手段威脅臺灣社會的「紅色滲透代理人」、「在地協力者」仍應由相關單位依情況而裁奪判定。而本文強調於學理框架中，應引入「水平傳播」的緣由，除了可避免國內政治輿情炒作的互相指控以外，亦也有助於劃清並區別出中共獨裁政權對其人民實施之「維穩內宣」，即「自上而下之政治縱向傳播」，在操作型定義上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對臺認知作戰」範疇中。

- 4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出「多模態」一詞在不同領域脈絡具有不同意涵，本文涵蓋其傳播學與心理學脈絡。在軍事上，宣傳輿論戰與心戰固常並行，而心戰於俄羅斯戰場中，尤以暗示恐嚇手段展顯其效，遂影響被攻者之信念、情感、態度及行為。於「認知心理學」與「知覺心理學」中，此現象謂之多模態「認知滲透」(cognitive penetration)——臨床實驗心理學揭示，即便是人類賴以生存之感官知覺，亦可經多模態操縱而異：如告槍傷者痛覺已麻醉（實注以生理食鹽水），此即安慰劑效應 (placebo effect)。本文強調於中共認知作戰威脅下，引介多模態框架之學理與實踐擔憂所由：(1) 於正式交戰之時，多模態認知作戰結合實體作戰，其心戰威懾（如幻覺、錯覺、無力感，或萌生投降輕生之意念），已於近年戰場上實際運用。(2) 當前半承平之際，開戰前夕，輿論戰及心戰目標之一，即近年政治學界所論「疑美論」、「鎖臺論」、「核平論」諸陰謀論。若中共運用得當，於選舉年具「介選效果」，並能促使外資撤臺，形成「經濟戰」之局面，如 1996 年之臺海危機。(3) 另令人憂者，環臺軍演及共機擾我識別區，恐致民衆對中共灰色地帶行動手段漠視，認兩岸無戰爭之可能，忽視「由演轉戰」之可能性。本文實際案例研究為：2024 年 6 月，筆者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 俄裔學者 A 教授（化名）。A 教授指出，俄軍進攻基輔前夕，烏俄國民與專家多數認為「特別軍事行動（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s, SMO）」不會發生。然普丁（Vladimir Putin）與其團隊，成功實施「（偏誤宣傳）輿論戰」與「心理戰」，大概除美軍情報部門外，無人掌握其真實軍事目標。A 教授感嘆：「戰前一天，烏克蘭民衆依然無備戰意識」。2022 年 2 月 24 日，普丁透過「由演轉戰」方式發動 SMO，令全球震驚。
- 5 學界與一般民衆常有疑惑或質疑：「即便確證有認知作戰之事實存

在，吾輩在制度建立與反應機制上可以有何應對」？本文初步示例兩答：（1）面對多模態認知作戰，當需運用多層次的傳播語言學方法解構敘事框架或脈絡，理解其語義構成範疇所塑造之形象，例如：涵蓋但不限於通過語義向量分析，掌握敵方輿論操控的語料與其傳播模式，並供政府、軍情、學院、智庫未來更深入的後續研究，俾利發展合理反制認知作戰的機制；（2）結合或整合現有平臺與資源，落實「公私協力」與「民主韌性」理論，本文提供初步可動態調整之政策建言。希冀此成果具初步的學理與實踐意義，提供國內鮮有討論的傳播框架與基礎理論適用奠基。本文重新審思中共對臺之認知作戰與當前臺灣民主韌性面臨的挑戰，冀憑上述方法可助吾人洞悉中共如何運多模態認知作戰，達成其各階段戰略目標，協助我方提前防範中共零日攻擊之威脅。演示供未來智庫專家深入以大型語料庫施作之可能方法學實作示例與初步成果介紹，除須瞭解認知作戰其多模態框架、特徵、模式、手段、案例外，亦須合理剖析中共其階段性戰略目標——俾利我方更能準確掌握認知作戰的各種可能樣態，制訂完善的應對方略。

- 6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本文的劃分，並不將國會職權修正案「本身」納入攻擊型或抵禦型「法律戰」的範疇，而視其本質上是我國法律議題之修訂討論所衍生可被敵對勢力操縱之「宣傳輿論戰」，而非如我方「反滲透法」此類「抵禦型法律戰」、或中共明定「頑固臺獨份子最高刑度處死」此類的「攻擊型法律戰」。本文礙於篇幅，暫且無法涵蓋拓展延伸至晚近逐漸開始受到矚目的「媒體戰」、「文化統戰」或「日常用語滲透」框架。雖有學者主張「媒體戰」、「文化統戰」或「日常用語滲透」亦可視作「認知作戰本身」或「認知作戰之證據」——然而，其涉及議題其實相當複雜，需要更穩固且周延的學理論述，本文礙於篇幅故無法涵蓋之。
- 7 關於（偏誤）宣傳輿論戰的「爭議資訊」面向，許多人所擔憂的問題是：「即便識別出認知作戰的語料或宣傳材料，我們還能夠再做什麼有意義的分析或研究？」。就爭議資訊面向，其中一個可能的回應是，參照目前既有事實查核平台的做法，針對假新聞或錯誤資訊做出澄清、並提供正確資訊（Yu & Ho, 2023）。然而，誠如本文所釐清，並非所有宣傳戰當中的爭議資訊皆透過假訊息方式傳遞

內容。有鑑於此，本文嘗試提供的另一種回應取徑是「框架標註」，透過多層次的傳播語言學分析，揭露敵方的敘事框架與戰略意圖。過去為國內傳播學界熟悉的常見方法是，運用批判話語分析揭示語言中的權力關係。而本文則提供詞彙共通義素語義場向量分析取徑示例，短期內即具有俾利熟悉相關原理與實作技術之量化研究者，做出更進一步拓展的學術效益——實務上，對於事實查證平台或智庫的應用層面，可以考慮對於「爭議資訊」新增「框架標註」與「立場標註」的功能，意即，某些「爭議資訊」有時可被視為「(片面)事實」，是基於其背後根據「特定意見立場所給出的詮釋」，運用向量分析揭示語義場的方式，容或提供了事實查核平台增添標註敘事框架的可能基礎。同時，國內已有針對資訊環境做出良好描述型統計之諸多團隊，對於其結合自然語言處理、語料庫研究、語體語域分類與整併計算語言學之未來前景發展，本文樂見其成。

- 8 本文強調，建立多層次的微觀與宏觀語言分析框架在未來是至關重要的，並首倡以「多層次傳播語言學」應對「多模態框架下的認知作戰」。多層次分析框架的優點在於提供全面系統性的分析視角，來整合多學科理論和方法，藉此掌握認知作戰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而在實務上，需要根據具體研究問題和目標，恰當且靈活選擇和整合不同層面的分析方法，故其在施作上的理論認知或技術門檻皆有一定要求，需要具有良好跨學科與跨領域知識背景的團隊，將跨領域不同層面的分析結果進行適當的整合型解釋。
- 9 本研究因應晚近傳播學方法受到 AI 快速發展與跨領域協作的衝擊，提供面對認知作戰之若干「可能方法學」與「政策建言」供參，並涉論當前時下廣為我國政府與社會討論之「民主韌性」等概念，初步說明其理論內涵與探討國外案例。雖然「民主韌性」此概念並不算非常新穎，然而，放諸國內甚至華語學界之學術論文，幾乎少見其討論蹤影。而「認知作戰」對於臺灣民衆最令人焦慮的關鍵問題是：「認知作戰是否恰巧打擊臺灣自由社會的民主政體，甚至會擊潰臺灣的民主韌性？」針對此，國人近年紛擾於假新聞與爭議訊息充斥、資訊環境不友善的情況，對於傳播學門能否應用理論至實務層面具有高度的期待。有鑑於此，本文探索臺灣本土民主韌性如何接軌國外理論的可能方法學，並提供實踐展望。

- 10 感謝匿名審查人總結本文之核心關懷：「在學術上，本文企圖跨領域整合傳播語言學的宏觀與微觀取徑，建立一套綜合多層次框架機制的反制認知戰措施；在政治上，提出民主韌性理論用於強化社會的反心戰能力，作為抵抗中共認知作戰的重要方法論之一；在軍事上，提供反擊中共多模態認知滲透作戰的實踐、程序、標準或方法，成為一套戰術策略指導」。最後，本文基於人本關懷立場呼籲：雖然認知作戰議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然而，此議題絕不應淪為純粹的政治操作工具而致使社會極化撕裂——因為越是極化的社會，在遭逢認知作戰的侵襲與破壞時，就越容易因其脆弱性而使其被擊潰（Miller, 2023）。因此，無論吾人接受何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傾向，皆應珍視臺灣這塊土地上民主與和平的得來不易，共同守護彼此的家園。

參考書目

- Chen, D., & Gao, G. (2022 年 9 月 30 日)。〈分析：娛樂明星如何成為共產黨宣傳「一個中國」的新工具？〉，《ABC 中文》。<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2-09-30/china-celebrity-ccp-propoganda-weibo-repost-nationalist-taiwan/101486770>
- Chris (2020 年 8 月 12 日)。【專訪】「中國對台資訊戰是一場認知作戰——iORG 解析 2020 大選假訊息樣貌（李柏鋒審稿）。INSIDE。<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1268-iorg-china-information-cognitive-war-taiwan-ait>
- 王韻 (2023)。〈統戰、銳實力、還是認知作戰？一個分析中共對臺宗教工作混合式影響力的架構〉。《遠景基金會季刊》，24(2)，5-53。<https://www.pf.org.tw/tw/pfch/17-10105.html>
- 沈伯洋 (2021)。〈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22(1)，1-65。<https://www.pf.org.tw/tw/pfch/17-7729.html>
- 松田康博（まつだ やすひろ）(2021)。〈中國對臺政策及臺灣總統選舉：1996-2000 年〉。《歐亞研究》，16，1-26。
- 林萱柔、陳怡全、傅文成 (2023)。〈探討 Covid-19 期間中國戰狼外交官的推特貼文之情感極化效果〉。《復興崗學報》，122，155-198。
- 朱鳳治、吳其昌 (2023 年 12 月 20 日)。〈多縣市里長赴中遭約談，最高檢 5 認定標準〉，《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72234>
- 長安視察 (2024 年 5 月 27 日)。〈銳評 | “我們中國人”！五月天的坦然打了誰的臉？〉，《新浪網》。https://k.sina.com.cn/article_6651881810_18c7ba95202001d17w.html
- 秦宛萱 (2020 年 3 月 18 日)。〈又是大外宣？「各國疫情失控」在推特大規模瘋傳，當神力女超人也轉傳中國官媒影片…〉，《信傳媒》。<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0367>
- 孫懋嘉 (2023)。〈數位威權主義下中共對臺網路監控寒蟬效應之評估〉。《遠景基金會季刊》，24(2)，55-101。<https://www.pf.org.tw/tw/pfch/17-10105.html>
- 傅文成、陳怡全 (2023)。〈從認知作戰策略觀點檢驗中共的推特戰狼外交〉。《遠景基金會季刊》，24(3)，3-63。<https://www.pf.org.tw/tw/pfch/17-10231.html>

- Adams, Z., Osman, M., Bechlivanidis, C., & Meder, B. (2023). (Why) is misinformation a problem?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6), 1436–1463.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221141344>
- Alagappa, M. (200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seev, M. A., & Dembitskyi, S. (2024). Victory-in-freedom: Ukraine's democratic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war. *Sociology: Theory, Methods, Marketing*, 2, 40–55. <https://doi.org/10.15407/sociology2024.02.040>
- Alvesson, M., & Spicer, A. (2010). Metaphors we lead by: Understanding leadership in the real world. Routledge.
- Ataboyev, I. M., & Turgunova, F. R. (2022). The concept of semantic field in linguistics. *ACADEMICIA: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 12(3), 319–324.
- Aydemir, E. (2022). Ukraine's cognitive warfare operations against Russia: Representation, story and micro-mythology. *Avrasya Uluslararası Araştırmalar Dergisi*, 10(32), 358–367. <https://dergipark.org.tr/tr/download/article-file/2657182>
- Backes, O., & Swab, A. (2019). *Cognitive warfare: The Russian threat to election integrity in the Baltic State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cognitive-warfare-russian-threat-election-integrity-baltic-states>
- Baker, P. (2006). 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 Continuum.
- Bartles, C. (2022). Sixth-generation war and Russia's global theatres of military activity. In A. Monaghan (Ed), *Russi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global power competition* (pp. 71–97).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7765/9781526164643.00011>
- Bartman, C. S. (2010). Lawfare and the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 What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n federation can teach us.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3(1), 423. <https://scholarlycommons.law.case.edu/jil/vol43/iss1/24>
- Bawarshi, A. S., & Reiff, M. J. (2010). Genr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Parlor Press LLC.
- Bayer, J., Bitiukova, N., Bard, P., Szakács, J., Alemanno, A., & Uszkiewicz, E. (2019).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impac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European Parliament's

- Policy Department for Citizens'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
- Beaman, K. V. (2024). Language change in real-and apparent-time: Coherence i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Taylor & Francis.
- Benbow, T. (2008). Talking 'bout our generation? Assessing the concept of '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 *Comparative Strategy*, 27(2), 148–163. <https://doi.org/10.1080/01495930801944685>
- Benner, T., Gaspers, J., Ohlberg, M., Poggetti, L., & Shi-Kupfer, K. (2018). *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MERICS and GPPI.
- Berendt, B. (2011). Text mining for news and blogs analysis. In C. Sammut, & G. I. Webb (Eds.), *Encyclopedia of Machine Learning* (pp. 968-972).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0-387-30164-8_827
- Bhatia, V. (2014). 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 A genre-based view. Bloomsbury Academic.
- Biber, D., & Conrad, S. (2009). *Register, Genre, and Sty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kh, I., & Alexandrov, V. (2016).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alysis using network science approach.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80, 1856–1864. <https://doi.org/10.1016/j.procs.2016.05.479>
- Blommaert, J., & Bulcaen, C. (200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9(1), 447–46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thro.29.1.447>
- Bodnieks, V. (2023). Defensive lawfare and deterrence: Analysis of Latvia's approach to legal bases in the context of hybrid warfare (2014-2022). *Security and Defence Quarterly*, 42(2), 55–67. <https://doi.org/10.35467/sdq/163435>
- Bontcheva, K., & Posetti, J. (Eds.). (2020). Balancing act: Countering digital disinformation while respe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Broadband commission research report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ddressing dis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Brady, A.-M. (2017, September 18).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magic-weapons-chinas-political-influence-activities-under-xi-jinping>

- Bryant, J., & Miron, D. (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4), 662–704.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2004.tb02650.x>
- Bryden, J., Wright, S. P., & Jansen, V. A. A. (2018). How humans transmit language: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matches word frequencies among peers on Twitter.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15(139), 20170738. <https://doi.org/10.1098/rsif.2017.0738>
- Buscemi, F. (2022). Multimodality of the TV Format. *Athens Journal of Mass Media & Communications*, 8(2), 93–106. <https://doi.org/10.30958/ajmmc.8-2-2>
- Cao, K., Glaister, S., Pena, A., Rhee, D., Rong, W., Rovalino, A., Bishop, S., Khanna, R., & Saini, J. S. (2021).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NATO Review*, 20.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l>
- Cardenal, J. P., Kucharczyk, J., Mesežnikov, G., & Pleschová, G. (2017).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Carment, D., & Belo, D. (2020). Gray-zone conflict management: Theory, evidence,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uropean, Middle Eastern & African Affairs*, 2(2), 21–41.
- Chaffee, S. H., & Metzger, M. J. (2001). 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365–37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25MCS0404_3
- Chan, M. P. S., Jones, C. R., Hall Jamieson, K., & Albarracín, D. (2017). Debunking: A meta-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icacy of messages countering mis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1), 1531–1546.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7714579>
- Chang-Liao, N. C. (2023). The limit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role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44(2), 226–247. <https://doi.org/10.1080/13523260.2023.2174702>
- Chiva, C. (2023). Gender and democratic resilience against autocratisation: The case of Romania's 'gender identity' bill.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Gender*, 6(3), 395–413. <https://doi.org/10.1332/251510821X16735398665628>

- Cho, Y. C., & Ahn, M. S. (2017). Taiwan'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suggestive no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72(1), 79–90. <https://doi.org/10.1177/0020702017692608>
- Choraś, M., Demestichas, K., Giełczyk, A., Herrero, Á., Ksieniewicz, P., Remoundou, K., Urda, D., & Woźniak, M. (2021).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fake news (online disinformation) detection: A systematic mapping study. *Applied Soft Computing*, 101, 107050. <https://doi.org/10.1016/j.asoc.2020.107050>
- Chouliarakis, L., & Fairclough, N. (2021).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ienki, A. (2008).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o political discourse: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an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In T. Carver & J. Pikalo (Eds.), *Political Language and Metaphor: Interpreting and changing the world* (pp. 241–256). Routledge.
- Čižik, T. (2017a). *Information warfare as a geopolitical tool*. Centre for European and North Atlantic Affairs.
- Čižik, T. (2017b).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in central Europe. In T. Čižik (Ed.), *Information warfare: New security challenge in Europe* (pp. 8–34). Centre for European and North Atlantic Affairs.
- Claverie, B., & du Cluzel, F. (2022a). “Cognitive warfare”: The advent of the concept of “cognitics” in the field of warfare. *Cognitive Warfare: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Dominance*, 2, 1–8.
- Claverie, B., & du Cluzel, F. (2022b). *The cognitive warfare concept*. Innovation Hub Sponsored by NATO 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 2022-2.
- Corn, T. (2006). World War IV as fourth-generation warfare. *Policy Review*, 135.
- Dancygier, B., & Vandelanotte, L. (2017). Viewpoint phenomena in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8(3), 371–380. <https://doi.org/10.1515/cog-2017-0075>
- Davenport, R. B. (2018). The Need for an innovative joi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force structure. *Joint Force Quarterly*, 88, 64–69.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1412317/the-need-for-an-innovative-joint-psychological-warfare-force-structure/>

- Davis, C. H. (2013). Audience value and transmedia products. *Media Innovations*, 175–190.
- De Montesquieu, C. (198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ncik, L., Hintz, A., & Cable, J. (2016). Towards data justice? The ambiguity of anti-surveillance resistance in political activism. *Big Data & Society*, 3(2).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16679678>
- Dencik, L., Hintz, A., Redden, J., & Treré, E. (2019). Exploring data justice: Conceptions, applications and direc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7), 873–881.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06268>
- Denning, D. E. R. (1999).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security (Vol. 4)*. Addison-Wesley.
- De Vynck, G. (2023, October 22). Some tech leaders fear AI. ScaleAI is selling it to the military: The tech start-up say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Silicon Valley to compete with china. others fear a deadly arms rac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3/10/22/scale-ai-us-military/>
- Diamond, L., & Schell, O. (Eds.). (2019). *China's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oover Press.
- Dimitrov, D., Ali, B. B., Shaar, S., Alam, F., Silvestri, F., Firooz, H., Nakov, P., & Da San Martino, G. (2021). Detecting Propaganda Techniques in Memes. *Proceedings of 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11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Volume 1: Long Papers)*, 6603–66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Dotson, J. (2024).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warfare directed against Taiw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Counter ideological work and political warfare" research series: paper #1).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https://globaltaiw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5/OR_CCP-Political-Warfare.pdf
- Dullieva, K. (2017). Semantic fields: Formal modelling and interlanguage comparison.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24(1), 1–15.
- Dunlap Jr, C. J. (2001, November 29). *Law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s: Preserving humanitarian values in 21st conflicts* [Paper presentation]. Humanitarian Challenges in Military Interventions Conference.

Cambridge, MA.

- Dunlap Jr, C. J. (2009). Lawfare: A decisive element of 21st-century conflicts? *Joint Force Quarterly*, 54, 34-39. https://scholarship.law.duke.edu/faculty_scholarship/3347
- Dunlap Jr, C. J. (2015). Lawfare. In J. N. Moore, G. Roberts, & R. Turner (Eds.), *National security law & policy* (3rd ed.) (pp. 823-838).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https://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6100&context=faculty_scholarship
- Edwards, M. (2014). *Civil Society*.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1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Routledge.
- Fan, Y. (2004). Taiwan: no civil society, no democracy. In M. Alagappa (Ed.),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 (pp. 164-19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tzGerald, M. C. (1994). The Russian military's strategy for "sixth generation" warfare. *Orbis*, 38(3), 457-477. [https://doi.org/10.1016/0030-4387\(94\)90008-6](https://doi.org/10.1016/0030-4387(94)90008-6)
- Floridi, L. (1999). Information ethics: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omputer ethic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1), 33-52. <https://doi.org/10.1023/A:1010018611096>
- Floridi, L. (2013). *The Ethics of In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oridi, L., & Taddeo, M. (2016). What is data ethic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74(2083), 20160360. <https://doi.org/10.1098/rsta.2016.0360>
- Forst, R. (2018). Toleration, justice and reason. In D. Castiglione & C. Mackinnon (Eds.), *The Culture of Toleration in Diverse Societies* (pp. 71-85).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Franke, U. (2015). War by non-military means: Understanding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Totalförsvarets Forskningsinstitut (FOI).
- Freidenberg, F. (2023). And, despite everything, they resist! The resilience of Latin American democracies. *lasa Fórum*, 54(2), 51-57.
- Gabrielatos, C., & Baker, P. (2008). Fleeing, sneaking, flooding: A corpus analysis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 1996-2005.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36(1), 5-38. <https://doi.org/10.1177/0075424207311247>

- Gee, J. P. (2007).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Ideology in discourses*. Routledge.
- Gerrits, A. W. (2018). Dis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 important is i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29(1-4), 3-23. <https://doi.org/10.1163/18750230-02901007>
- Gershaneck, K. K. (2019). Media warfare: How Taiwan can win the battle for the cognitive domain.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journal*, 19(1), 66-101.
-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ldenziel, J. I. (2020). Law as a battlefield: The US, China, and the global escalation of lawfare. *Cornell Law Review*, 106, 1085-1172.
- Greenawalt, K. (1989). Free speech justifications. *Columbia Law Review*, 89(1), 119-155. https://scholarship.law.columbia.edu/faculty_scholarship/84
- Gunatilleke, G. (2021). Justifying limitations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Human Rights Review*, 22(1), 91-108. <https://doi.org/10.1007/s12142-020-00608-8>
- Hamilton, C. (2018).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Hardie GrantBooks.
- Hansen, A., & Machin, D. (2018).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Bloomsbury Publishing.
- Heeks, R., & Shekhar, S. (2019). Data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marginalised urban communities: An applied data justice framewor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7), 992-1011.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599039>
- Herman, D. (2017). *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MIT Press.
- Hill, S. G., & Stokowski, P. A. (1997). Stevenson, Nick. (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 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9(4), 472-476. <https://doi.org/10.1080/00222216.1997.11949811>
- Holzmann, A. F. (2020). *Artists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propaganda, psychological warfare,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a proposal for its ever-changing future* (Master thesis).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 Hsiao, H. H. M. (2006).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1980-*

2005. In H.-H. Michael Hsiao (Ed.), *Asian new democracies: The Philippin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ompared*(pp.?).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 Hsu, M.-C. (2024). Inoculating society against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igital age: Fortifying the barracks against authoritarian cognitive warfare.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2024(May-June), 22–34.
- Hsu, S.-C., & Cole, J. M. (2020). *Insidious power: How China undermines global democracy*. Eastbridge Books.
- Hull, G. A., & Nelson, M. E. (2005). Locating the semiotic power of multimodality. *Written communication*, 22(2), 224–261. <https://doi.org/10.1177/0741088304274170>
- Hung, T. C., & Hung, T. W. (2022). How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works: A frontline perspective of Taiwan’s anti-disinformation war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7(4), ogac016. <https://doi.org/10.1093/jogss/ogac016>
- Iasiello, E. (2021). What is the role of cyber operations in information warfare?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14(4), 72–86. <https://www.jstor.org/stable/48633489>
- Jaitner, M. (2015).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Lessons from Ukraine. In K. Geers (Ed.), *Cyber war in perspective: Russian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pp. 87–94). NATO CCD COE Publications.
- Jie, D. (2012). Sovereignty–security nexus,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policy (1988–2010). *Asian Security*, 8(2), 188–212. <https://doi.org/10.1080/14799855.2012.690246>
- Just, J. (2024).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for innovation search–Reviewing an emerging non-human innovation intermediary. *Technovation*, 129, 102883. <https://doi.org/10.1016/j.technovation.2023.102883>
- Kamalu, I. (2016). Politics and promises: A multimodal social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emblems and slogans as discourse of hope in a democratic Nigeria. In D. O. Orwenjo, O. Orwenjo, D. O., Oketch, O., & Tunde, A. H. (Ed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mergent, fragile, and failed democracies* (pp. 112–125). IGI Global.
- Khan, A., Brohman, K., & Addas, S. (2022). The anatomy of ‘fake news’: Studying false messages as digital object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7(2), 122–143. <https://doi.org/10.1177/026839622110>

- Khurana, D., Koli, A., Khatter, K., & Singh, S. (2023).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tate of the art, curr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82(3), 3713–3744. <https://doi.org/10.1007/s11042-022-13428-4>
- Kim, B., Xiong, A., Lee, D., & Han, K. (2021). A systematic review on fake news research through the lens of news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Research effort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loS one*, 18(12), e026008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60080>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484–501.
- King, P. (2013). *Toleration*. Routledge.
- Kittrie, O. F. (2016). *Lawfare: Law as a weapon of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 (2003).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shnan, A. (2022). Fifth generation warfare, hybrid warfare, and gray zone conflict: A comparis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15(4), 14–31. <https://doi.org/10.5038/1944-0472.15.4.2013>
- Lakoff, G., & Johnson, M. (2008).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zer, D. M. J., Baum, M. A., Benkler, Y., Berinsky, A. J., Greenhill, K. M., Menczer, F., Metzger, M. J., Nyhan, B., Pennycook, G., Rothschild, D., Schudson, M., Sloman, S. A., Sunstein, C. R., Thorson, E. A., Watts, D. J., & Zittrain, J. L.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Addressing fake news requires a multidisciplinary effort. *Science*, 359(6380), 1094–109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o2998>
- Levitsky, S., & Way, L. (2024). The resilience of democracy's third wav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57(2), 198–201. <https://doi.org/10.1017/S1049096523000914>
- Lewandowsky, S., Ecker, U. K., & Cook, J. (2017). Beyond m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post-truth” er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6(4), 353–369. <https://doi.org/>

10.1016/j.jarmac.2017.07.008

- Lewandowsky, S., Ecker, U. K., Seifert, C. M., Schwarz, N., & Cook, J. (2012). Misinform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Continued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debia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3(3), 106–131. <https://doi.org/10.1177/1529100612451018>
- Lin, Y.-Y. (2023).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against Taiwan and Taiwan's countermeasures. *Taiwan Strategists*. 20, 37–5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220613001-N202312210022-00003>
- Lührmann, A. (2023). Disrupting the autocratization sequence: Towards democratic resilience. In Lührmann, A., & Merkel, W. (Eds.), *Resilience of Democracy* (pp. 149–171). Routledge.
- Lührmann, A., & Merkel, W. (Eds.). (2023). Resilience of democracy: Responses to illiberal and authoritarian challenges. Routledge.
- Masafumi, IIDA (2024, May 5). China's chilling cognitive warfare plans: War is entering a new, and very frightening, domain.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5/chinas-chilling-cognitive-warfare-plans/>
- Masakowski, Y. R., & Blatny, J. M. (2023). *Mitigating and responding to cognitive warfar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Tech. Rep.
- Masferrer, A. (2023). The declin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in Wester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36(4), 1443–1475. <https://doi.org/10.1007/s11196-023-09990-1>
- Mattsson, P. A. (2015). Russian military thinking-A new generation of warfare.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1(1), 61-70.
- Mayer, F. W. (2014). Narrative politics: Stor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zarr Dr, M. J. (2015). *Mastering the gray zone: 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era of conflict*.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https://press.armywarcollege.edu/monographs/428>
- McAllister, C., & Nelson, D. M. (Eds.). (2013). *War by other means: Aftermath in post-genocide Guatemala*.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cCrory, D. (2020). Russian electronic warfare, cyber and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Ukraine: Implications for NATO and security in the Baltic

- states. *The RUSI Journal*, 165(7), 34–44. <https://doi.org/10.1080/03071847.2021.1888654>
- Mendez, A., Forcadell, F. J., & Horiachko, K. (2022). Russia–Ukraine crisis: China’s belt road initiative at the crossroads.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21(4), 488–496. <https://doi.org/10.1057/s41291-022-00195-1>
- Mill, J. S. (1998).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S. (2023). Cognitive warfare: An ethical analysi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5(3), 46. <https://doi.org/10.1007/s10676-023-09717-7>
- Milton, J. (2014). *Areopagitica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UK.
- Monaghan, P., & Roberts, S. G. (2019). Cognitive influences in language evolution: Psycholinguistic predictors of loan word borrowing. *Cognition*, 186, 147–158.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9.02.007>
- Moore, A. D. (Eds.). (2005). *Information ethics: Privacy, property,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orlino, L., & Raniolo, F. (2017).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South European democracies. Springer.
- Musolff, A. (2008). What can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ad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acist ideology? Recent studies of Hitler’s antisemitic metaphor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2(2), 1–10. <https://ugp.rug.nl/cadaad/article/view/42070>
- Nathan, A. J., & Scobell, A. (2014).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wey, G. (2019). *Virtue, reason and toleration: The place of toleration in ethical &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Nord, M., Lundstedt, M., Altman, D., Angiolillo, F., Borella, C., Fernandes, T., Gastaldi, L., Good God, A., Natsika, N., & Lindberg, S. I. (2024). *Democracy report 2024: Democracy winning and losing at the ballot*.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V-Dem Institute.
- Nye Jr, J. S. (2018, January 24).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24. 2023.108927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 Otieno, R. F., Owino, F. R., & Attyang, J. M. (2016). Metaphors in political

- discourse: A review of selected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 7(2), 21–26.
- Paul, C., & Matthews, M. (2016). The Russian “firehose of falsehood” propaganda model: Why it might work and options to counter it. *Rand Corporation*, 2(7), 1–10.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198.html>
- Poyet, C., Niemikari, R., & Raunio, T. (2024). What mak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resilient to crises? Applying a no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the case of Fin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32(1), 246–261. <https://doi.org/10.1080/14782804.2023.2230456>
- Prier, J. (2020). Commanding the trend: Social media as information warfare. In C. Whyte, A. T. Thrall & B. M. Mazanec (Eds.),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he age of cyber conflict* (pp. 88–113). Routledge.
- Purwanto, S. (2008).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rhetorical strategies to reveal the struggle of ideology in Richard Mann’s plots and schemes that brought down Soeharto. *Dinamika Bahasa dan Budaya*, 2(1), 1–12.
- Quirk, S. (2021). Lawfare in the disinformation age: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2020 elec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62, 525–567. https://journals.law.harvard.edu/ilj/wp-content/uploads/sites/84/HLI205_crop-2.pdf
- Qureshi, W. A. (2019). Lawfare: The weap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1), 39. <https://heinonline.org/HOL/LandingPage?handle=hein.journals/hujil42&div=4&id=&page=>
- Rafaeli, S. (1988). Interactivity: From new media to communication. Sage Annual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16(1), 110–134.
- Rashid, A. B., Kausik, A. K., Al Hassan Sunny, A., & Bappy, M. H. (202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ilitary: An overview of the capabilities,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2023(1), 8676366. <https://doi.org/10.1155/2023/8676366>
- Reed, D. J. (2008). Beyond the war on terror: Into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war and conflic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31(8), 684–722. <https://doi.org/10.1080/10576100802206533>
- Regan, M., & Sari, A. (2024). Hybrid threats and grey zone conflict: The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m, H. J. (2023).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dominating, and managing networks. *Asian Perspective*, 47(1), 1–25. <https://dx.doi.org/10.1353/apr.2023.0000>
- Roozenbeek, J., & Van der Linden, S. (2019). The fake news game: Actively inoculating against the risk of misinformation.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2(5), 570–580. <https://doi.org/10.1080/13669877.2018.1443491>
- Santos, F. C. C. (202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utomated detection of disinformation: a thematic analysis. *Journalism and Media*, 4(2), 679–687. <https://doi.org/10.3390/journalmedia4020043>
- Schauer, F. (2018). Must speech be special? In L. Alexander (Ed.), *Freedom of Speech* (pp. 343–377). Routledge.
- Schmitt, M. N. (2017). Grey zon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yberspac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nline*, 42(2). <https://ssrn.com/abstract=3180687>
- Schmitt, M. (2021). Foreign cyber interference in election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97, 739–764.
- Schmitt, M. N., & Watts, S. (2015).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pinio Juris* and the law of cyber warfare.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0, 189–231. <https://ssrn.com/abstract=2481629>
- Scolari, C. A. (2014).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New ways of communicating in the digital age. In *Anuario AC/E de cultura digital—Focus 2014: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pp. 68–79). Madrid, España: Acción Cultural Española. Retrieved from <https://repositori.upf.edu/handle/10230/26242>
- Shae, Z., & Tsai, J. (2019). AI blockchain platform for trusting news. *2019 IEEE 3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ICDCS)*, pp. 1610–1619.
- Shein, E., Emmons, C., Buril, F., & Lemargie, K. (2023, December 11). Paths to democratic resilience in an era of backsliding: A roadmap for the democracy support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 <https://www.ifes.org/publications/paths-democratic-resilience-era-backsliding>
- Shen, P., Chen, Y., & Tseng, P. (2022). Relating credibility to writing style,

- emotion, and scope of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Warfare*, 21(3), 13–25.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199980>
- Slipchenko, V. I. (2002). *Voyny shestogo pokoleniya. Oruzhie i voennoe iskusstvo budushchego* [Wars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Weapons and military art of the future]. Veche Publishing.
- Song, A. M. (2023). Civilian at sea: Understanding fisheries' entanglement with maritime border security. *Geopolitics*, 28(3), 1161–1185. <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21.1997995>
- Stubbs, M. (1996). *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Computer assisted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ey-Blackwell.
- Swaine, M. D., & Mulvenon, J. C. (2001). *Taiwan'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RAND Corporation.
- Taddeo, M. (2012). Information warfar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5, 105–120.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11-0040-9>
- Tamariz, M., & Kirby, S. (2016).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language.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37–43.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5.09.003>
- Tavani, H. T. (2012). *Ethics and technology: Controversies, qu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ethical computing*. Wiley Publishing.
- Taylor, L. (2017). What is data justice? The case for connecting digital rights and freedoms globally. *Big Data & Society*, 4(2), 2053951717736335.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17736335>
- Thompson, S. (2018). Politics without metaphors is like a fish without water. In J. S. Mio & A. N. Katz (Eds.), *Metaphor* (pp. 185–201). Psychology Press.
- Thorhauge, A. M., & Lomborg, S. (2016). Cross-media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Medie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60), 70–86. <https://doi.org/10.7146/mediekultur.v32i60.22090>
- Thornton, R. (2015).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odern warfare: Responding to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160(4), 40–48. <https://doi.org/10.1080/03071847.2015.1079047>
- Trachtman, J. P. (2016). Integrating lawfare and warfare.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9(2), 267–282. <https://ssrn.com/abstract=2948981>

- Tsipursky, G., Votta, F., & Roose, K. M. (2018). Fighting fake news and post-truth politics with behavioral science: The pro-truth pledge. *Behavior and Social Issues*, 27, 47–70. <https://doi.org/10.5210/bsi.v27i0.9127>
- Vogel, K. M., Reid, G., Kampe, C., & Jones, P. (2021). The impact of AI on intelligence analysis: Tackling issues of collaboration,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36(6), 827–848. <https://doi.org/10.1080/02684527.2021.1946952>
- Volacu, A., & Aligica, P. D. (2023). Conceptualising democratic resilience: A minimalist account. *Contemporary Politics*, 29(5), 621–639. <https://doi.org/10.1080/13569775.2023.2213536>
- Walker, C., & Ludwig, J. (2017, November 16).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16(1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 Wang, A. H.-E., Lee, M.-C., Wu, M.-H., & Shen, P. (2020). Influencing overseas Chinese by tweets: Text-images as the key tactic of Chinese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3, 469–486. <https://doi.org/10.1007/s42001-020-00091-8>
- Werner, W. G. (2010). The curious career of lawfare.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3(1), 61–72.
- West, M. J., & Insisa, A. (2024). Reunifying Taiwan with China through cross-strait lawfare. *The China Quarterly*, 257, 186–201.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23000735>
- Westlund, O., Larsen, R., Graves, L., Kavtaradze, L., & Steensen, S. (2022). Technologies and fact-checking. A sociotechnical mapping. In J. C. Correia, P. Jerónimo, & I. Amaral (Eds.), *Disinformations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an emerging field* (pp. 193–236). Beira Interior University. <https://hdl.handle.net/11250/3032844>
- Williams, B. (1996). Toleration: An impossible virtue? In Heyd, D. (Ed.), *Toleration: An elusive virtue* (pp. 18–2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400822010.18>
- Xiang, J., Primiano, C. B., & Huang, W. H. (2015). Aggressive or peaceful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a's militarized conflict, 1979–2010.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De Gruyter*, 21(3), 301–325. <https://doi.org/10.1515/peps-2015-0004>

Yu, M. T. C., & Ho, K. (2023). COVID and cognitive warfare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8(2), 249–273. <https://doi.org/10.1177%2F00219096221137665>

附錄一、原始語料（語言材料）

語料一：《新浪网》原始文章〈锐评 | “我们中国人”！五月天的坦然打了谁的脸？〉

近日，台湾乐队五月天在演唱会与观众互动时，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引发全场欢呼。而这一幕却让岛内某些人“破了防”，比如赖清德就以一句“盼民众谅解”试图挽尊，结果遭到群嘲。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一针见血指出，两岸人民本就都是中国人，什么时候称“我们中国人”是一件需要被原谅的事？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写在历史经纬与法理事实中，也刻在两岸同胞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里。数据显示，现居台湾的两千多万人中，闽南泉州、漳州人后裔占 80%，闽台还有 280 对同名同宗村。从民间信仰、饮食习惯到节日习俗、祭祖礼仪等，台湾社会的发展无不延续着中华传统。歌仔戏、布袋戏等传统戏曲发迹闽粤，“天下妈祖回娘家”一脉相承，街道命名处处可见大陆色彩……无论从哪方面看，两岸同胞都同根同源、同文同宗，是绝对的一家人。

乡关何处是，两岸皆故土。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说明两岸同胞心之所系，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反倒是一闻此言就浑身不自在，暴露出一些人的色厉内荏。众所周知，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数典忘祖、挟洋自重，自甘充当西方“制华”的马前卒，在“台独”邪路上越走越远。为营造“天然独”假象，其更不顾岛内民众反对，在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大搞“去中国化”。从力推“无耻课纲”改革、阻挠两岸人员交流，到虚无中国史建构所谓“新台湾史”，种种闹剧滑天下之大稽。而执意断根抽魂的他们，自然见不得两岸同胞亲近。但是，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台湾社会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岂是人为力量可以剔除的？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说到底，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受到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势力野蛮干预而拖延至今。但两岸政治上的分离，并非国土分裂，台湾这个游子也终将伴随民族复兴脚步而回家。“倚美谋独”“以台制华”不可能如愿，只会进一步加速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这些年，为有力震慑种种谋“独”行径，大陆有针对性地持续

强化对台海地区的管辖能力，从美国在台海“秀肌肉”屡屡被拦截，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绕岛巡航成为常态，再到这次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更是形成了立体化威慑。雷霆亮剑，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回击，也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定捍卫。

就在“台独”分子进行卖国祸台表演时，一些台湾艺人积极转发支持祖国统一的帖文。这种跨越两岸的团结和共识，映照出全体中华儿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共同心愿。还是那句话：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祖国统一势不可挡！

語料來源：

长安观察（2024 年 5 月 27 日）。〈锐评 | “我们中国人”！五月天的坦然打了谁的脸？〉，《新浪网》。https://k.sina.com.cn/article_6651881810_18c7ba95202001d17w.html

附錄二、匿名訪談資料

筆者，2024 年 6 月。當面訪談，受訪人 A，俄羅斯籍教授。